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整理研究

仇 江*

一、引 言

清末以來，嶺南的佛教多處於衰落艱難的局面，由於人為及自然的原因，佛門寺廟庵堂大都破敗失修，經論語錄、詩文雜著等佛教文獻遭受極大損失。近三十年來雖有所恢復，但有關的文獻資料還是非常缺乏，有件小事頗能反映這種狀況。

一九八六年，時任中國佛協會長的趙樸初老先生到廣東韶關市仁化丹霞山別傳寺視察，曾給正住錫興復該寺的本煥老和尚贈詩一首：

群峰羅立似兒孫，高坐丹霞一寺尊。定力能經桑海換，叢林尚有典型存。

一爐柏子參禪味，七盃松濤覓夢痕。未得《徧行堂集》看，願將半偈鎮山門。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未得《徧行堂集》看」一句。趙老先生學識淵博，深知曾為南明諍臣後為嶺海名僧的澹歸和尚與他的《徧行堂集》，如今來到澹歸誅茅開發的丹霞山，自然想起澹歸圓寂九十五年後猶遭禁燬的名著《徧行堂集》，可惜的是，在當年澹歸住錫之地，也沒有他的著作保留下來。「未得《徧行堂集》看」，老先生失望遺憾之情，溢於言表。身為全國佛教協會的首腦，想看一套清代名僧的詩文集也不可得，其他一般人便可想而知了。當時佛教史料文獻之缺失貧乏，可見一斑。

要改變這種狀況，首要的工作，無疑是蒐尋史料，重加整理，出版傳世。只有儘快把倖存的史料保護好，然後才能談別的。實際上，倖存至今的有關史料已經不多了，而且因蟲蛀、老化等原因還在不斷消失，因而對這些文化遺產的保護整理工作，非常急迫。

* 仇 江，廣州中山大學古文獻研究所榮退教授。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於與本煥老和尚的一段因緣，我與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哲學系、歷史系等單位的學人開始關注嶺南佛門史料的整理工作。

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初，中國古文獻研究所曾經接受一個項目，為社會上各個領域的代表人物寫傳記，其中佛門代表選定時年八十多歲的老和尚——本煥大師。因此一機緣，我與老和尚結緣交往。當時本老正住錫廣州光孝寺，我們經常造訪，對光孝寺有了更清楚詳細的認識，我逐步產生了整理點校古本《光孝寺志》的念頭，老和尚對此也十分支持，並欣然為我題寫書名。

由此因緣，自一九九八年開始，我們著手調查其他嶺南古寺志書及嶺南佛學文獻的存世情況，計劃進行系統的整理。十年來，在黃國聲、陳永正兩位教授的指導下，先後展開《嶺南名寺志·古志系列》、《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華嚴叢書》三個系列的編纂整理工作，均取得一定程度的進展，基本上得以出版。參加此役者有：廣州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仇江、楊權、鍾東；哲學系馮煥珍；圖書館李福標、鍾稚鷗、馬德鴻、蔣文仙、張紅；歷史系萬毅；以及南昌大學段曉華、華南師範大學曹旅寧、廣州大學曾燕聞、廣東省博物館朱萬章、廣州市社科院陶乃韓、廣州藝博院杜靄華等。具體整理方式為：（一）研究每種文獻的內容、價值、作者生平、版本流傳情況，理清脈絡，寫出〈前言〉；（二）採用善本作點校底本，參校他本以及有關別集、方志用補遺缺；（三）加注新式標點；（四）糾正錯字，改正俗體字、自造字，保留古今字、通假字；（五）有改動處或他本有歧義之異文出校記。

本文主要對以上我們所做的工作，做一個概要的回顧與展望。

二、項目因緣與進展

下面具體介紹《嶺南名寺志·古志系列》、《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和《華嚴叢書》這三個項目的發生因緣和進展情況。

（一）《嶺南名寺志·古志系列》

佛教的歷史，以圖像及文字記錄的寺志無疑是最重要的載體之一，因此對嶺南古寺志的整理，是首要的基礎工程。

中土自古就有修志的傳統，嶺南的寺院，歷代多有有心人士為其修撰寺志。這

些寺志比較系統地記載了有關寺院的歷史沿革與當代的狀況，包括地理、建置、法統、規約、宗旨、人物、語錄、廟產、賦役、藝文、題詠等等，是瞭解佛教在嶺南地區傳播、發展歷史的珍貴資料，對於研究當地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宗教、民俗諸項，具有重大的價值。

早在三國時，吳國將經學家虞翻貶謫嶺南廣州，虞翻卒，他的後人捨其宅「虞苑」建制止寺，此後千數百年來，嶺南所造寺院何限，所修寺志不知凡幾，而由於人為及自然的原因消亡殆盡，至今存世者不過《曹溪通志》、《陰那山志》、《光孝寺志》、《丹霞山志》、《鼎湖山志》、《禺峽山志》、《華峯山志》七種，而且《丹霞山志》與《陰那山志》都是孤本，亦只大體完整而已。碩果僅存的這批古寺志，是研究嶺南佛門歷史以及有關宗教、文化、學術、經濟、民俗等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獻。

一九九八年我們開始整理工作，第一種自然是《光孝寺志》，二〇〇〇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杭州富陽華寶齋古籍書社印刷。以繁體字豎排，線裝，以存中國古籍的傳統風貌。二〇〇三年，又以同一規格出版了《丹霞山志》。這兩種古寺志的整理本面世，受到學術界、宗教界的好評。二〇〇五年初，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將《嶺南名寺志·古志系列》列為二〇〇四年度該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

二〇〇六年，《華峯寺志》、《禺峽山志》、《鼎湖山志》、《陰那山志》等先後問世。二〇〇八年五月，《曹溪通志》出版。至此，《嶺南名寺志·古志系列》的整理工作遂告完成。

茲將「古志系列」七種作敘錄，分述如下：

1. 光孝寺志

查《光孝寺志》版本源流狀況如下：

- (1) 明崇禎《光孝寺志》，不存。
- (2) 清乾隆《光孝寺志》，不存。
- (3) 民國八年(1919)梁鼎芬藏舊抄本《光孝寺志》（缺卷四至卷八），下落不詳。
- (4) 民國十三年(1924)雲逢銓藏光孝寺庫抄本《光孝寺志》（缺卷四至卷八），下落不詳。

(5) 民國二十二年 (1933) 順德大良重刊鉛印本《光孝寺志》(全)，存。

(6) 民國二十二年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光孝寺呈心堂抄本《光孝寺志》(全)，存。

(7) 民國二十四年 (1935) 中華書局排印版《光孝寺志》，存。

明崇禎十三年，張悰編撰《光孝寺志》出版，如今該版《寺志》已不傳世，然實為乾隆《光孝寺志》之基礎。乾隆《光孝寺志》，顧光修，何淙纂輯。

廣州光孝寺是嶺南歷史最悠久、影響最深廣的廟宇。據寺志記載，寺址本是西漢時末代南越王趙敬德之宅第。三國時東吳虞翻居此講學，「多植蘋婆、苜蓿，時人稱為虞苑，又曰苜蓿林。翻卒，後人施其宅為寺，扁曰『制止』」(《乾隆光孝寺志·建置志》)。

東晉隆安中，罽賓國三藏法師曇摩耶舍始創為王苑朝廷寺，又稱王園寺。唐貞觀十九年 (645) 改稱乾明法性寺。宋太祖建隆三年 (962) 改為「乾明禪院」。徽宗崇寧二年 (1103) 改為「崇寧萬壽禪寺」。政和元年 (1111) 改乾明寺為「天寧萬壽禪寺」。宋高宗紹興七年 (1137) 改稱報恩廣孝禪寺，二十七年易「廣」字為「光」字，沿用至今。自東晉以迄唐代，印度來華僧人在寺中譯經、說法者甚眾。梁武帝天監元年 (502)，梵僧智藥三藏攜菩提樹來，植於該寺壇前，為中國最早有之菩提樹，後菩提樹成為中國佛教的象徵。武則天神龍元年 (705)，西域僧般刺密諦攜《楞嚴經》來，唐宰相房融居寺潛心翻譯，中國之有《楞嚴經》自此始。唐儀鳳元年 (676)，中國禪宗六祖惠能在該寺作過著名的「風、幡」辯論，並在菩提樹下削髮受戒，寺廟名聲益著。

明崇禎間，光孝建寺已逾千年，以求那跋陀羅、達摩、惠能諸聖事蹟影響甚大，而「考以志乘，寥寥無聞。詎非千餘年之曠典待人而興乎」(明葉廷祚：《光孝寺志·原序二》)? 有見及此，時在寺內參與結社唱和之張悰發願為寺修志。張悰，字樨攄，廣州府人，曾任官學教職。他「與二三同社銳然創始，搜遺編、咨近事，葺以成書」(《光孝寺志·原序二》)。所成《光孝寺志》二卷，分殿宇、建置、法寶、聖錫、人物、檀越、藝文七章，共約數千言。張悰編撰寺志，受到宰官南海縣令朱光熙的支持，朱在《光孝寺志·原序一》中讚許說：「善知識樨攄張子簡尋遺蹟，綜核說明，洵屬不朽編纂。」當時的嶺南名士，由進士而官至太常寺卿的葉廷祚欣然為《光孝寺志》寫序，稱此書：「博而不失之濫，詳而不失之瑣，典而有體，信而可傳。」

明版《光孝寺志》於崇禎十三年(1640)刻印出書，印數不詳。年久失傳，全書面貌不得而知。但讀清乾隆版《光孝寺志》中保留之張儆為各章所撰序言，則可知他在文學、史學、佛學諸方面皆頗有根基。初版寺志出書未足十年，明朝覆亡，清軍炮轟廣州西城殃及光孝，部分廟宇被毀，寺藏《光孝寺志》刻版毀於兵火。明《光孝寺志》雖不免簡略，但它是千年光孝第一部寺志，保留了清代之前的許多有關史料，成為清乾隆版新志的基礎，開創之功，殆不可沒。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時任廣州知府顧光，字實甫，號涑園，浙江仁和人。他與光孝寺住持僧圓德多有往來，「玄言妙諦，往返扣擊，針芥相投」，得觀張儆所著寺志，「惜其簡略，發願重修。會連平何君厚宜適來羊城，何君博聞強識，雅善著述，於是相與商榷考證，芟其繁蕪，補其闕誤，為目十二」（顧光：《光孝寺志·序》）。住持圓德參與寺志的校讎及刊印，自道：「節口縮腹，竭蹶以從。」（圓德：《光孝寺志·序》）初稿完成，顧光又命門生溫聞源校讎全稿。溫聞源，字華石，順德縣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鄉試中試。在此之前順德文試中考取頭名，因得為顧光門生。由於多人參與，故乾隆版《光孝寺志》的編纂者列名依次為：

朝議大夫知廣州府事仁和顧光實甫綜修

連平何淳厚宣纂輯

順德溫聞源華石參訂

訶林釋成鑒圓德校修

清光孝志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成書，時距明志出版已一百三十年。清志以明志為基礎，由二卷增至十二卷，篇幅擴充至十餘萬字。卷首有圖；次顧光、溫聞源、釋圓德三序；次舊志朱光熙、葉廷祚、龐景忠三序；次目錄；次張儆舊志諸卷序言；又次正文：卷一〈法界志〉、卷二〈建置志〉、卷三〈古跡志〉、卷四〈法寶志〉、卷五〈淨業志〉、卷六〈法系志〉、卷七〈名釋志〉、卷八〈檀越志〉、卷九〈語錄志〉、卷十〈藝文志〉、卷十一〈題詠志上〉、卷十二〈題詠志下〉。該志多方面記述光孝一千多年的歷史發展，內容豐富，頗稱完備。據此可瞭解千年光孝古往今來的盛衰演化：從西來的古僧曇摩耶舍、求那跋陀羅到禪宗的初祖達摩、六祖惠能，再到明清時振興禪宗的憨山大師、天然和尚，一系列大師名釋的活動，顯示了佛教特別是禪宗在中華大地萌芽、發展、興盛的軌跡；從最古的戒壇、大殿，到風旛堂、筆授軒、譯經臺、祖堂、伽藍殿、睡佛閣、方丈，從菩提樹、達

摩井、洗鉢泉到瘞髮塔、大悲幢、蓮池、鐵塔，不論今物古蹟，或存或滅，無不折射出歷史的幽光；從皇帝的敕令到官府의 割文，從歷代檀越的捐捨，到寺產田畝房舍的變遷，從琳琅滿目的碑記、銘序、語錄，到千百年來無數墨客騷人的詩賦題詠，從各方面真切地表現了中土朝野上下，特別是嶺南士眾對佛教的態度。同時，《光孝寺志》立例謹嚴，記敘平實，較少一般山志、寺志常有的大量的菩薩聖蹟、感應靈異等內容。凡此種種，對研究嶺南的宗教尤其是禪宗的歷史，提供了可貴的資料。

經歷一千七百年至今法輪常轉的古剎，又配有較為完備的寺志，這在中國佛教史上也是少有的。光孝寺及其志書都是嶺南歷史上極為珍貴的文化遺產。

明清兩代兩次刻印《光孝寺志》，可惜都沒能流傳後世。

從乾隆三十四年(1769)刻印《光孝寺志》，至民國二十二年(1933)出版順德大良鉛印本《光孝寺志》，其間一百六十多年，未發現有《光孝寺志》的其他印本。估計在嘉慶後，都只以抄本傳世。廣東近代著名藏書家徐紹桀(信符)在〈重刊光孝寺志序〉中說：「《光孝寺志》為乾隆時顧光修，版毀已久，僅有抄本。」「書者輾轉傳抄，斯志賴以不滅。」既是輾轉傳抄，自然錯漏不免。從現存的資料推斷，《光孝寺志》在相當長的一段期間缺失了其中的卷四至卷八，甚至連寺藏本也不例外。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光孝呈心堂《光孝全志》抄藏本，一套六冊，其中第三冊(包括卷四至卷八)用紙不同，筆跡不同，明顯是另抄補入，而且在第三冊卷首原編纂者列名後增加了「花翎同知銜四川補用知縣北京通州周恒益旭初光緒十七年歲在辛卯蕤賓月重錄」共三十四字，可見此寺藏本也是光緒十七年(1891)才補足的。同時光孝呈心堂抄本卷首有中山大學教授容肇祖在民國二十二年(1933)的按語，記述收購此書的經過，其中云：「前數年，有持梁氏鼎芬舊抄本索價百金，未購。梁氏抄本缺卷四至卷七。」梁鼎芬(1859-1919)，清代遺老、詩人、藏書家，所藏的《光孝寺志》抄本，亦缺中間數卷，可見當時寺志普遍是不完整的。因此，找到缺失部分而令《光孝寺志》得以補全的周恒益的確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不過後來的抄、印者多把他的姓名刪去。

現存《光孝寺志》的抄(印)本，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以光孝呈心堂抄藏本為代表的較齊全的本子；另一類則錯漏頗多而流傳較廣，可以民國十三年廣東法官學校監學雲逢銓所藏《光孝寺志》抄本(簡稱雲氏藏本)為代表。

光孝呈心堂抄藏《光孝全志》稿本，民國二十二年(1933)中大教授容肇祖經手

購入，他在書首按語中記道：「此卷得之光孝寺老衲。」「售書之老衲未一月即病卒。山門典故，鄉邦文獻，賴此書之流出而反保存，余於此書不能不深加愛護也。」

此稿本共六冊，除另補的第三冊外，皆用光孝呈心堂之稿紙，抄寫極為認真，字體端莊，整齊清潔。書末〈題詠志下〉並附張維屏、黃培芳諸人詩作。張、黃等皆生於乾隆《光孝寺志》出版之後，可見寺僧一直不斷收集資料，抄錄當時名人詩文以補充寺志。此稿本卷帙完整，順序妥當，脫漏甚少，可稱善本。

現存《光孝寺志》抄本，多非善本，就我所見，只有中山圖書館善本室所藏媚秋堂抄本接近呈心堂抄本。

民國二十二年(1933)，《光孝寺志》排印出版，始末如下：民國八年(1919)，順德人溫珏養厝羊城，「與（光孝）寺方丈僧時相過從，獲觀斯志。據云此志為本寺唯一記載，故歷久庋藏，不輕示人」。溫珏「發願力任重刊，以廣流傳。僧亦慨然許諾」（溫珏：〈重刊粵東光孝寺志序〉）。十四年後，溫珏出資，由順德大良昌興行排印出版了《光孝寺志》。他在序言中說：「惟原本字多舛錯，而法典淵懿，校勘頗難。」「姑就曩聞，雇匠傳抄，付之剞劂。」大良版的寺志印刷平平，錯謬頗多，全書超過一百之數。幸而所據為善本，尚未有重大紕漏。溫珏在校讎補訂方面用功不足，不過還有自知之明，希望「後之閱者，倘亦諒其抱殘守缺之苦衷，而恕其因訛承謬之譴陋也乎」（溫珏：〈重刊粵東光孝寺志序〉）。本版寺志印數不詳，由於地域及質量的限制，看來流傳不廣。目前所見，只有廣州中山圖書館地方文獻部所藏的一套。

再談以雲氏藏本為代表的另一類抄本。

雲氏藏本出自光孝寺庫房。民國十九年復由廣州惠福東路景雲樓據雲氏藏本抄錄《光孝寺志》，卷首有廣東法官學校校長姚禮修（栗庵，字栗若）的按語：「民國十三年(1924)，收（光孝）寺為法官學校。監學雲唯心逢銓在寺庫搜得抄本，今藏雲處，是為孤本。此余長校時複抄者。」除景雲樓這種抄本外，還有無名氏《寫本光孝寺志》與雲氏藏本也十分相近。

雲氏藏本雖與呈心堂抄本同出光孝寺，但兩者出入頗多。由於栗庵等人認為雲氏藏本「是為孤本」。除複抄之外，還「細心補訂付梓，俾廣流傳」（景雲樓抄本《光孝寺志·按語》）。民國二十四年，得廣東省教育廳支持，廣東編印局委託法官學校教員廖景曾校讎《光孝寺志》，並交付中華書局排印出版。所用底本，極有

可能就是經栗庵補訂的雲氏藏本。但也不能排除是徐紹棨在〈重刊光孝寺志序〉中提到的「番禺盛季瑩濠堂」藏本。不過即使採用濠堂本，它與雲氏藏本也是一類，並非善本。

廣東省教育廳廳長黃麟書為新版《光孝寺志》寫了序。徐紹棨也為文介紹寺志的歷史及本版出書緣起。廖景曾曾作校讎補訂，並考證出志中兩個空缺的人物姓名。

一九三五年中華書局版《光孝寺志》印刷裝訂相當精美，並採用先進技術，刊載多幀實景照片，讓讀者更真切地領略光孝古寺的風貌。此版流傳較廣，影響頗遠。

當年由於認定雲氏藏本是孤本，「無他本可校」（栗庵：《景雲樓抄本光孝寺志・按語》），故許多舊志的脫漏錯謬之處得不到改正。舉其著者如：卷九〈語錄志〉脫語錄一則共五十四字；卷十〈藝文志〉的〈光孝寺重修山門碑記〉一文脫三句共十八字；卷十一〈題詠志上〉的〈菩提紗歌〉脫三句共二十一字。另有脫漏短句及詩文作者姓名籍貫等十餘處。文中錯別字頗多，如將明末嶺南名士梁朝鍾誤為梁朝宗，住持僧圓洸誤為圓洗，等等。全書十二卷，只卷十〈藝文志〉一卷，錯漏便達一百多處。由於底本不善造成不少錯漏，甚為可惜。

這次點校，以光孝呈心堂抄藏之《光孝全志》稿本為底本，以民國二十二年（1933）順德大良重刊本、民國二十四年（1935）中華書局排印本及無名氏《寫本光孝寺志》參校。於底本有改動者，概出校記。校記三十三條附於正文之後。

新版《光孝寺志》由仇江、曾燕聞點校，仇江撰〈前言〉，北京中華書局於二〇〇〇年出版。

2. 丹霞山志

查《丹霞山志》版本源流情況如下：

- (1) 康熙三十八年（1699）刊本《丹霞山志》，不存。
- (2) 雍正十一年（1733）《增訂本丹霞山志》，存。
- (3) 光緒九年（1883）抄本《丹霞山志》，存。

《丹霞山志》，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陳世英纂修，釋今龜、釋今遇合校，陶煊、吳壽潛、劉授易同輯。雍正十一年（1733），釋古奘刪訂，釋古如增補。

廣東仁化縣丹霞山，峻壁森羅，岩谷幽邃，擅山川之勝。山上別傳古寺，夙號

名剎，與附近之曲江南華、乳源雲門二寺，並稱粵北三大叢林，為各方人士瞻崇，歷久不替。

清初，嶺南許多志士仁人眼見復國無望，又不願與新朝合作，乃剃度出家，託跡緇流，以貞厥志。南明禮部尚書何吾驥之子、愛國詩人何鞏道形容當時的景況：「十年王謝半為僧。」正是其真實寫照。而此時的禪門尊宿、曹洞宗三十四世傳人函昱天然和尚，道行高深，門風清峻，先後投到他門下的有數千人。天然與他的弟子所主持的海雲寺、海幢寺、華首臺寺、芥庵、無著庵等佛門淨地，成為明遺民託身立命之所。

丹霞山別傳寺，就創建於這樣一個天翻地覆、風雲激變的時代。康熙元年(1662)，天然和尚的第四法嗣今釋澹歸進入丹霞開山建寺。澹歸和尚俗名金堡，崇禎進士，南明諍臣，國破出家，師從天然。五載辛勞奔波，廟宇初具規模，澹歸便迎請本師天然和尚開法丹霞，弘宣象教。數載轉輪，禪風遠播，衲眾歸心，聲徹嶺南。天然和他的本師道獨，法弟函可，他的法徒今無、今釋，曹洞宗華首一系三代僧人，他們的經解語錄都入《嘉興藏》。別傳寺的住持，繼天然、澹歸之後有今辯樂說、今遇澤萌、今龜角子、今但塵異、古梵圓音、古奘願來、古如密因等高僧，靡不道氣文心卓然並茂，各有詩文語錄傳世。在別傳寺創建之初的一百年間，其僧眾素質之高，著作之多，影響之大，在嶺南佛教史上是少有的。因此，別傳寺雖然建寺較晚、僻處深山，而聲名後起，駸駸乎與南華、雲門等千年古寺並駕而成粵北名剎。

至乾隆一朝，號稱盛世，而文網日密，清算愈嚴。乾隆四十年(1775)，澹歸和尚文字獄案發，澹歸雖早已圓寂近百年，亦遭椎碑剗字、毀塔揚灰之劫，所有著作焚書燬版。天然一系僧人悉數被逐離丹霞。輝煌一百多年之別傳寺從此韜光隱彩，歸於平淡。

別傳寺的寺志，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由仁化縣知縣崑山（今湖南新田）陳世英主修，別傳寺僧今龜角子、今遇澤萌和尚校訂，文士廣陵吳壽潛、寧鄉陶煊、湘潭劉授易撰輯。廣東學政臧興祖、清初著名學者潘耒、主修陳世英分別作序。次年春，廣東布政使魯超亦為此志作序，估計《丹霞山志》初版成於是年。初版山志收錄了清初名僧澹歸和尚開闢丹霞山創建別傳寺的大批文字資料，詳細記述了別傳寺開山前後的早期歷史，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惜乎世變滄桑，初版本亦歸淪沒，今天已不可得見。據雍正增訂本保留原山志諸志小序，可知原志分七部分，分別是：

形勝、疆界、建置、源流法統、人物、田賦、藝文。

雍正十一年 (1733)，別傳寺僧古奘願來、古如密因和尚對康熙刊本《丹霞山志》作了刪訂增補，補充了初版後自康熙三十九年 (1699) 至雍正十一年 (1733) 增訂時這三十二年的歷史，仍為十卷，刻版重印，是為雍正增訂本。本版山志，首為魯超、臧興祖、潘耒、陳世英四序；次圖畫；次乞山偈、次捨山牒、次山水總序，以上諸項，估計初版中已有，至此或有增刪。又次正文：卷一〈形勝疆界志〉、卷二〈建置志〉、卷三〈源流法統志〉、卷四〈規約格言志〉、卷五〈宗旨志〉、卷六〈人物志〉、卷七〈田賦志〉、卷八、九、十〈藝文志〉。將初版之「形勝」、「疆界」合為一志，另增「規約格言」、「宗旨」二志。這次所印的寺志，後來因乾隆四十年澹歸和尚文字獄案的牽連，亦遭焚書燬版之災，瀕於滅絕，至今只有孤本存世。該本現由上海圖書館珍藏。

現今除此孤本外，《丹霞山志》還有一雍正增訂本的抄本傳世。抄錄者程運南，字儀生，號素庵居士，西蜀漢平（今涪陵）人，是清末一位當幕客的文士。光緒九年 (1883)，程運南的幕主向東森任仁化知縣，程氏亦隨至仁化。向東森：「聞丹霞有志，欲得一觀，訪之通邑，僅獲一部，不無殘缺。」程氏受向東森之囑，將該志「抄錄一通，並檢閱郡志邑乘，尋覓山中題壁，纂輯增入」。程氏對此項工作十分認真，連殘破書頁上的字都對照位置一一抄錄下來，可說是「一字不漏」。可惜原書本就殘缺，故抄本遺漏之處亦復不少。可喜者是，抄本畢竟補足了刊本的某些殘缺、錯序之處，而且還增補了部分內容，如別傳寺某些僧人的生平史料，以及雍正十一年 (1733) 增訂本刊行後至光緒十年 (1884) 之間一個半世紀中有關丹霞山、別傳寺的一些詩文，還是有價值的。該書將抄本中增補的資料摘錄一二，附於校訂重刊本正文之後。

如前所述，由於別傳寺的開法祖師天然和尚以及今釋、今辯、今龜、古梵、古奘等都具有高深的學問修養，以他們的經解語錄、詩詞文章為主體的《丹霞山志》，無論在佛教經義或者文學藝術方面都達到相當高的水準。

該書點校，以清陳世英修纂、釋古如增補之雍正十一年 (1733)《丹霞山志》為底本，參校以下諸書：清程運南《丹霞山志》抄本（光緒九至十一年，1883-1885）、清釋函昞《天然禪師語錄》（清嘉興藏本）、清釋函昞《瞎堂詩集》（清刊本）、清釋今釋《徧行堂集》、《徧行堂續集》（乾隆五十年 [1785] 刊本）、明郭棐撰、清陳蘭芝增輯《嶺海名勝志》（乾隆五十五年 [1790] 刊本）。於

底本有改動者，概出校記。但該書第九卷詩集錯序不少，茲據程氏抄本從頭理順，前後調動之處太多，此類改動不再出校。校記附於正文之後。共出校記四十九條。

此書由仇江、李福標點校，仇江撰〈前言〉，北京中華書局於二〇〇三年出版。

3. 華峯山志

《華峯山志》，清釋鑑傳編纂。

增城縣華峯山，位於縣城南八十里，「巖壑蒼深，林巒幽邃，古寺一厂，別有洞天，老梅百株，自成香國」（黃映奎：《華峯山志·序》）。是當地著名的風景名勝，華峯寺，又名「海門禪院」，就建在這泉石煙霞之中。

《華峯山志》，清光緒間華峯釋鑑傳編撰，海門禪院刊印，所記華峯寺法系由中興祖師南樵和尚至第十三代主僧鑑傳，時間從康熙二十一年（1682）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對華峯山的環境風物、海門寺的歷史人事及題詠詩文有較詳明的記述，保存了清代嶺南佛門一段史料，頗有價值。

關於《華峯山志》作者鑑傳的資料很少，據《增城縣志》及其他有關書籍，只知他是清末南海人，增城湖都華峯山海門寺住持僧，有《藏拙堂詩存》。

通過《華峯山志》，我們對釋鑑傳可以有個較為詳細的瞭解。光緒四年（1878），鑑傳入住華峯山海門禪院。光緒十七年（1891），鑑傳籌劃重修海門禪院，作〈募修華峯寺疏〉，又請本邑秀才湛沛生作〈重修華峯寺小引〉，並將該文刻碑紀事；當年，嘉應葉世琦為鑑傳的《藏拙堂詩存》作序。至寺院重修事竣，鑑傳〈寺中重修落成口占〉詩中有句：「不負經營志，閑來鼓素琴。」可知他對重修寺院一事頗為滿意。光緒二十年（1894），閩漳孫寶章「寓海幢秀林園讀書，得晤鑑傳上人，語次即成知己」（孫寶章：〈贈鑑傳上人詩〉）。光緒二十二年（1896），孫寶章為《藏拙堂詩存》作序。光緒二十六年（1900），鑑傳編撰之《華峯山志》刻印出書，孫寶章及廣州名士黃映奎俱為作序。以上是釋鑑傳一段簡歷。

《華峯山志》更為鑑傳勾勒出具體的形象：葉世琦在〈藏拙堂詩存序〉中記鑑傳：「好讀書，耽吟詠，嘗與文人學士遊。」「天懷淡雅，志趣高簡。」「其入道也甚深，其植品也甚高，今之參寥、懷素也。」香山居士黃映奎稱鑑傳為「華峯主人今賈島」（黃詩〈庚子秋九月讀華峯山志寄題華峯寺〉句），又在《華峯山志》中稱讚華峯寺第七世祖師覺海和尚與第十三世住持僧鑑傳是「兩代詩名，一門禪

藻」，給予很高的評價。而與鑑傳「交最厚，知之亦最深」的孫寶章形容鑑傳「狀貌慈慧而胸次浩然」，「人品高曠，不必藉詩而始著」，「是為詩僧之詩」。並指出：「海幢實多詩僧，而公之主華峯，實承海幢之派。」（俱見孫氏為《藏拙堂詩存》所作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評點，道出了鑑傳詩學所宗的源泉。

雖然作序者一般會有溢美之辭，但綜觀《華峯山志》與《藏拙堂詩存》，作者鑑傳大體上還是能符合序主推重之言的，可以說，鑑傳是一位自課嚴，自守潔，以佛醒心，以詩明志的詩僧，不愧為海幢派的傳人。海幢派首領阿字今無和尚是雷峯山海雲寺天然函昺和尚的首徒，鑑傳亦即海雲詩派的傳人。《華峯山志》的面世，為嶺南文學特別是嶺南詩歌、海雲詩派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

另外，華峯寺歷代祖師的傳記，反映出華峯海門寺與雷峯海雲寺長期以來十分密切的關係：華峯寺第五代祖師慎修老和尚得法於雷峯海雲古寺，晝年主席海雲，退院後圓寂於海雲寺智月堂；第十一代祖師惺麼老和尚同樣得法於雷峯海雲寺，後主席雷峯，大為興創，退院後歸隱華峯，壯心未已，往金山再創海潮禪院；至清末光緒年間，華峯寺第十三世主僧鑑傳，亦與海幢寺僧多有交往，據孫寶章回憶：「余寄居海幢之日，暇常從公（鑑傳）遊。」（〈藏拙堂詩存序〉）可見海門寺與海幢、海幅、海潮諸寺一樣，皆以海雲寺為宗，與海雲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對於清代曹洞宗華首一脈在嶺南的傳承發展，這是很重要的史料。

《華峯山志》，釋賢竹題寫封面及扉頁；次仇江〈前言〉；次賢竹〈新刊華峯山志序言〉；又次李虹彩墨山水「海門寺遠眺」等十幅；又次海門華峯寺古匾、碑拓本十幅；又次為孫寶章〈序〉、黃映奎〈序〉、釋鑑傳〈自序〉；次「原山圖」。正文卷一記開山、古蹟、名勝、檀越，列祖傳記；卷二施山施田碑帖，募修疏引、詩集序言；卷三歷代題詠；卷四《虛舟遺稿》；卷五《藏拙堂詩存》。綜觀全書，內容未免單薄，因華峯僻處羊城東偏，遊客東向，每至廣州名勝「羅崗香雪」而止，再往東者幾希。「本山荒僻」，「譴陋貽譏，在所不免」（鑑傳：《華峯山志・凡例》）。故鑑傳雖有仿成鸞修《鼎湖山志》之意，而二志在內容、文字、結構等方面的差距還是相當大的。

《華峯山志》自光緒二十六年（1900）出書，未見重版，百年之後，至今傳世甚少。《華峯山志》撰述認真，刻版細緻，印刷精良。今以原版《華峯山志》作底本，加以標點，個別改動、疑難處出校記。

原書有「山圖」一幅，新增彩墨「山圖」十幅，由畫家李虹繪製；海門禪院尚

存若干古碑，由廣州市博物館鍾潤生、廣州藝術博物院陳玉蘭、胡美英、中山大學圖書館馬德鴻、李景文諸老師赴華峯山翻拓共十幀，置諸卷首。

此書由仇江、鍾稚鷗點校，仇江撰〈前言〉，華寶齋古籍書社於二〇〇六年出版。

4. 禺峽山志

查《禺峽山志》版本源流情況如下：

- (1) 明版《禺峽山志》，不存。
- (2) 康熙四年刊本，不存。
- (3) 康熙末年刊本，存。
- (4) 同治刊本《禺峽山志》，存。
- (5) 光緒刊本《禺峽山志》，存。

《禺峽山志》，清孫繩祖纂修。

二禺山，又名中宿山，距清遠城三十里。世傳軒轅帝二子大禹、仲陽降居南海中宿山南北，故山號「二禺」。山當百粵上游，束瀋、湟諸水而赴於海，故曰「峽」。史載為方輿第十九福地。

《禺峽山志》在明代已經成書，清初由夏雲、孫繩祖先後整理增刪，有清一代幾度刊印，是倖存至今的七種嶺南古寺志書之一。

清初鼎革，前代禺峽舊志殘闕散失，難覓蹤影，清遠邑人夏雲憂慮名山面目從此湮沒，「一日於友人齋頭得舊志全稿，退歸北禺閒軒，參互校訂，正其魚魯，增以纂修近事，為卷者四。事皆據實，無所阿比，蓋取其信而可傳，以俟後之作者」（夏雲：〈修禺峽山志序〉）。夏雲是清初當地著名的文人，據民國《清遠縣志·先達》記述：「夏雲，字文石。父九疇，善詩文，隱於峽山，與諸衲為方外友。邑令禮為鄉賓，世皆重其耆〔耆？〕德。雲少夙慧，能屬韻語，有神童之目，十五善屬文，補邑弟子員，益研究墳典，尤肆力於詩，上溯秦漢，下迨唐宋，靡不博綜，每登臨興發，伸紙疾書，咄咄有驚人之句。屢舉不偶，以歲薦終。著有《二禺志》，輯邵謁遺稿傳世。喻、陳兩邑侯聘修縣志，悉心纂輯，洵有功於文獻。」康熙四年乙巳（1665），夏雲出資五十餘貫，將整理稿刻印出書，這是《禺峽山志》自明入清之後第一次出版。把舊志保存下來，是夏雲的功勞，可惜沒有記下舊志的出版年代及作者姓名，美中不足。也可能有關史料舊志已經闕如了。這版《禺峽山

志》早已失傳。

康熙末年，清遠知縣孫繩祖在夏《志》的基礎上，重新編排整理，並捐俸刊印。孫繩祖，瀋陽人，監生，有文才，工書法。於南粵為官二十餘載，所到之處提倡文運不遺餘力。光緒《石城縣志·職官》有〈傳〉：「孫繩祖，滿洲鑲紅旗人，康熙四十一年(1702)知本縣事。興廢舉墜，不遺餘力，創建松明書院，修邑志，心切愛民。」「尤好文士，獎誘備至；性耽吟詠，公餘時或與文人同僚相唱酬，閱石門各處皆有題詠。在任十一年，民情感戴。」康熙五十二年(1713)初，孫繩祖調任清遠知縣，就在這一年，「四月大饑，知縣孫繩祖捐俸，倡率典史楊士芳……暨城廂內外紳士富戶捐銀，買米賑濟，民賴以安」（光緒《清遠縣志·前事》）。據此可見本版《禺峽山志》中廣東藩使王朝恩所作〈序〉稱孫繩祖「其才敏，其守潔」，「雖宦橐蕭然，澹如也」。並非溢美之辭。

孫繩祖認為舊志存在明顯的不足，如：「不分綱領條目，似失體也」；「各篇首末列總論」，也不合志書體裁；「規制俱已改觀，而舊志仍多載原名，致探奇攬勝者視桑田猶喚滄海，則惑甚矣」；「『建置』、『古蹟』內竄入題詠，錯雜無倫」（《禺峽山志·志例》）等等。針對以上的缺陷，孫繩祖將全書總列提綱，各分次目，諸篇首增寫緒論，以符志書體例；修正山水名勝、殿宇亭臺之名目，以符事實，俾遊者心目了然；蒐輯有關題詠，整理舊作，按朝代、體裁分卷。

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禺峽山志》刊刻出書，這是該志在清代第二次出版。經過孫繩祖整理的《禺峽山志》，條分縷析，文字通達，於各篇首標列總論，體例嚴謹，達到較高的水準。一百多年後兩次重版，直至如今點校出書，使用的還是這個版本。據《廣東文獻綜錄》載，康熙六十年版的《禺峽山志》珍藏於國家圖書館善本室，可惜我們至今無緣拜讀。

較之清初出版的光孝、曹溪、丹霞、鼎湖等幾種寺志，《禺峽山志》的特點是明顯的。

首先，《禺峽山志》是一本內容豐富，描繪出色的山水志。禺峽位於嶺南與中原水路來往之要衝，飛來寺年代久遠，禺峽的傳說動人心弦，遍地古蹟引人遐思，路經的各式人等大都慕名而參，其中不乏遷客騷人、達官名士，往往留下詩文墨寶，歷朝積累，題詠之豐富，實為粵中諸寺志之冠。對於保存清遠一地的歷史文化古蹟，起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由於該寺屢遭人為及自然災害，興廢無常，故而《禺峽山志》中法統源

流及經解語錄等史料較為單薄，這本是一般山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而《禺峽山志》中關於本寺高僧的記載，亦只有達摩，「隨寺飛來」的貞俊、靈靄，南華僧聰公、了玟，以及明顏、慧顯等數人，有些還明顯是傳說中的人物。至於寺院規則、說法語錄諸項，更是付之闕如。這不能不說是《禺峽山志》一個不可忽視的缺陷。

至同治元年壬戌(1862)，當時峽山寺由廣州長壽寺管理，退院僧本淨和尚在宰官許文深支持下重修峽山寺，許文深並捐廉重梓《禺峽山志》。該版在舊志的基礎上增加了兩廣總督勞崇光的〈峽山志序〉，書後附長壽寺僧成果〈重梓峽山志後跋〉，岡州羅天池為題寫書名。這是《禺峽山志》在清代第三次開雕，印本至今猶存。

光緒十年甲申(1884)，清遠知縣羅煒（江西廣昌人，舉人。光緒五年知清遠縣）因前版《禺峽山志》「閱時久遠不加愛護，板歸無何有之鄉」，「若不重刊，久必湮沒，無所考據」。乃「將舊本略加校訂，捐廉為之倡始」（羅煒：〈重修禺峽山志序〉），並有尚義善堂紳董黃崐熊等勸緣贊助出書。本版改正了同治版少數明顯的錯字，增加了羅煒一篇序，還有時人的若干詩詞，後附本寺僧壽康的〈續梓峽山志後跋〉。光緒版《禺峽山志》看來是重用了同治朝的刻版，印刷字跡較為粗糙，並有墨跡漫漶之處，而且前版頁碼的缺失及編排上的錯訛亦一依其舊。

光緒版之《禺峽山志》，卷首分別為咸豐十一年(1861)勞崇光〈序〉、康熙六十年(1795)王朝恩〈序〉、康熙五十九年(1794)孫繩祖〈序〉、光緒十年(1884)羅煒〈序〉。正文前為「禺峽圖經」、山水名勝圖，次〈志例〉。正文卷一，名勝備考：山水、古蹟、仙釋、事實；建置沿革：殿宇、坊表、碑刻、匾額、寺產；卷二，古今藝文：誥敕、傳贊、說文、碑記、賦集；卷三，登臨題詠：唐詩、宋詩、元詩、明詩；卷四，登臨題詠：國朝詩、詞集。次為同治版補入之釋成果詩賦。再次為光緒重刊補入時人詩詞。又次為同治元年釋成果〈重梓峽山志後跋〉，最後為光緒十年釋壽康〈續梓峽山志後跋〉。

這次點校，以光緒版《禺峽山志》作底本，以同治版作參校。少數詩賦朝代錯亂的予以調正，不出校；原書缺失之處，以括號中文字說明，不出校；有較多的詩文缺題目或作者名字者，據光緒、民國兩版《清遠縣志》中「山水」、「勝蹟」、「金石」、「藝文」諸卷補闕或訂正，不出校。有錯訛改正處出校記，總附全書之後。原書「登臨題詠」之末附同治間釋成果少量詩賦及光緒間若干時人詩文，今為增加標題。

此書由仇江、曾燕聞、馬德鴻點校，仇江撰〈前言〉。北京中華書局於二〇〇六

年出版。

5. 鼎湖山志

《鼎湖山志》，又作《鼎湖山慶雲寺志》，清釋成鷺編撰。

鼎湖山慶雲寺是嶺南四大叢林（另為廣州光孝寺、曹溪南華寺、潮州開元寺）之一，在佛教界頗具聲譽；而在嶺南佛教史上，其地位尤著。明末，無明慧經禪師壽昌法系下曹洞宗第二十七世江西博山無異元來（1575-1630）之高足長慶道獨（1599-1660）、天湖道丘（1586-1658）南下嶺表傳法。道獨主華首一脈，發軔於粵東羅浮山之華首臺寺。道丘則開山於粵西鼎湖山慶雲寺。

鼎湖山所在的肇慶地處兩廣交通的咽喉，是明清之際兩廣總督府和南明永曆政權所在地。一代志士曾滙聚於此，在政治鬥爭中搏擊風浪。南北文化的碰撞與反思，是此時端溪書院儒學和慶雲寺佛教勃興的直接文化背景。佛教在肇慶的傳播頗早，兩晉時期在西江土著俚僚族中就有了甚深的信仰。蕭梁天監年間（503-519）端州始建峽山寺。唐代肇慶的佛教更值得大書特書，新興縣出了六祖惠能，高要縣亦出了高僧希遷。如果把慶雲系法脈往上追溯，就可直與大鑑惠能相接，慶雲寺祖庭鼎湖山白雲寺，乃盧祖會下高足智常奉本師「各為一方」、「不失本宗」之教，於唐高宗時所建。明萬曆三十六年（1608）前後，愍山德清分化嶺表，登遊鼎湖，小住白雲寺。一日山行，深入谷中名「虎窩」處，心賞其地「峰巒環抱，外比內附，狀若蓮花」，更名蓮花峰，並預言「不久當有福慧大人闡化於此」。崇禎六年（1633），山麓上迪村居士梁少川入山誅茆建蓮花庵，適新會朱子仁（1611-1685，即後來的弘贊和尚，字在慘，號木人，相傳為明藩王後裔）發足參方，道出高峽，遂邀入同住，不久改蓮花庵為慶雲庵。崇禎九年（1636）棲壑道丘應弟子弘贊之邀主法慶雲。

棲壑住錫的慶雲寺以禪宗為主，亦兼修淨土宗與律宗。棲壑師承無明慧經、無異元來，又受蓮池祿宏與愍山德清的深刻影響。此數大師都提倡禪、淨雙修，如無異元來就主張「禪、淨無二」、「說淨土亦得，說禪亦得；說淨土即禪、禪即淨土亦得」（《無異元來禪師廣錄》）。可見棲壑之兼修是在眾大德指引下的高自樹立，後世讚棲壑云：「力弘博山之道，更嚴淨毗尼……禪、淨、律三教並行。自有佛法以來，未有如吾師之兼善者也。」（慶雲寺第六代住持圓捷一機：〈開山立法棲老和尚行狀〉）道丘對慶雲座下比丘的修為、學識要求甚高，在開法之初，就遵

無異元來和蓮池祿宏之遺教，制定了一整套謹嚴的佛教儀軌和寺規，即所謂「博山鐘鼓，雲棲法規」。這針對五季、趙宋以來禪僧大都深據山林而不講佛理，以致空疏不學、狂禪泛起的現象而言，可謂走了補救的、復古的、向上的一路，讓世人看到佛教的嶄新風範和希望，為近代虛雲等大師的佛教改革運動提供了啟示，良可貴也。

道丘主寺二十二年間，慘澹經營；又經二代祖弘贊繼武前修，弘揚法力，終將慶雲寺建成殿宇莊嚴、結構完整的大叢林。

《鼎湖山志》作者成鷺(1637-1719)，番禺韋湧名家子，俗名方顯愷，字麟趾。少年適逢國難，中歲皈依佛門。康熙十八年(1679)禮羅浮山石洞禪院元覺離幻和尚出家，派名光鷺，字即山，得嗣其法；次闡化於瓊州府會同縣多異山海潮巖靈泉寺，依平陽祖派改「光」為「成」，故改名成鷺，別字跡刪；三轉南海馬山龍華禪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遷香山縣創東林庵，又曾住錫澳門普濟禪院。晚年住持番禺縣大通(寶光)古寺。著作有《紀夢編年》、《金剛直說》、《莊子內篇注》及《咸陟堂詩文集》等行世，在當時嶺南佛門中稱「文字般若第一」，後梁啟超亦稱其「蓋樂以文字而為佛事者」。

康熙四十七年(1708)成鷺跡刪接任第七代住持，時慶雲寺已開山七十餘年，寺院建設日善，香火更旺，常住達數千指之眾，生活也日趨安逸，隨之僧眾矛盾紛爭日多，戒律日益鬆弛。本年閏三月六代祖圓捷示寂，而成鷺之來遲至歲末，住持虛席將近十月，寺務幾致廢弛。成鷺升座不久亦遭排擠。《鼎湖山志》書前丁易〈序〉云：「正法方興，群邪側目。有盜常住一抔土者，懼其不利於己也，合眾口以燦金。」又孫毓琨〈序〉云：「(成鷺)時為群犬所吠，予奉上命，力為驅除。自後鼎湖一席，無復有窺竊常住之人。」成鷺住持的慶雲寺何去何從，必藉本寺開山祖師法力與外護之助，方得解決，而纂修《鼎湖山志》乃其大契機。

成鷺與《鼎湖山志》因緣頗早。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代祖契如和尚就發願修志，文名甚著的成鷺應邀入鼎湖主其事。惜契如翌年圓寂，志稿未成而成鷺離山。時隔近十年，成鷺被推為慶雲住持，後緣續前因，寺志之纂得重新啟動。此次修志根本目的在於以祖師開山之傳統教育僧眾，申明大義。不讓昔之嚴謹戒律儀軌因今之安逸而隳敗，成鷺訂立了〈重申祖訓約〉，又著〈僧鐸〉讓寺僧於禪堂、老堂等處時時提唱，以重振戒風。並將其編入《鼎湖山志》，形成定制。成鷺還親自選定鼎湖山「十景」，邀集各方文士賢達覽勝觀光，唱和題詠，為慶雲寺在鼎湖山清修

正名安分，排除外界干擾；此外，成鷺還把登臨題詠之什編入《鼎湖山志・藝文志》中，這也是鼎湖山作為風景區的首次正式記述。此志之修得慶雲寺大護法肇高廉羅道丁易的鼎力支持，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得以最後完成並付梓。

《鼎湖山志》初版書前有本年樊澤達〈序〉、王炳〈序〉、孫毓琮〈序〉、鄭際泰〈序〉、丁易〈序〉，附「鄭際泰繪圖」。此志分八卷，卷一為〈鼎湖山總論〉、〈星野疆域〉、〈山川形勢〉、〈殿閣堂寮〉、〈創造緣起〉、〈新舊沿革〉；卷二為〈開山主法〉；卷三為〈繼席弘化〉，卷四為〈清規軌範〉；卷五為〈耆碩人物〉、〈檀信外護〉；卷六為〈登臨題詠〉，卷七為〈藝文碑碣〉；卷八附《山中雜誌》，卷末有成鷺之〈跋〉及〈志後緒言〉。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增補再印，書前加趙弘燦〈序〉、陳元龍〈序〉、吳柯〈序〉、宋志益〈序〉、王經方〈序〉、賈棠〈序〉。另志中所記成鷺生平及詩文署名「七代住持成鷺」者，亦增補本所加，當時成鷺已退院返回廣州大通寺。

成鷺身為高僧大德和著名文士，又以慶雲寺住持身分親自編纂《鼎湖山志》，整齊凡例，挈領提綱，以折衷群言，自是左右逢源，得心應手。總體來說，此志資料豐富而翔實，文字簡明而具文采，文末時或著「僧史曰」以發論，講明戒律，章顯宗旨。此志在當時為整頓和扭轉寺風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且為後人研究嶺南佛教史及地方史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原始文獻。在修志體例上也為後來者提供了範本，光緒年間增城《華峯山志》即仿《鼎湖山志》之體例而纂修。成鷺自稱「思取信於將來，庶無慚於往哲」，不虛也。

本次整理以康熙五十六年(1791)增補本作底本，參校《咸陟堂集》、《紀夢編年》等，加新式標點和簡單校勘，改動之處出校記。共出校記四十二條。

此書由李福標、仇江點校，李福標撰〈前言〉，北京中華書局於二〇〇六年出版。

6. 陰那山志

《陰那山志》是粵東梅州陰那山靈光寺之寺志。作者明末邑人李士淳，初成於天啟元年(1621)。入清後有李閩中、李淦等人先後數次翻刻或重修續刻。

自古以來，陰那山靈光寺就是粵東地區歷史古老，影響廣大的廟宇。陰那山位於粵東梅州市東南八十里雁洋鎮境，秀甲潮、梅，名播粵、閩，古人有稱其為佛教勝境，堪與羅浮、曹溪鼎足而三者。靈光寺僻處陰那山麓，為粵東著名古寺，所奉

祖師號「慚愧」，俗姓潘，福建省沙縣人，唐憲宗元和十二年(817)三月二十五日生。據傳慚愧大師出生時左手拳曲，故取名「拳」，後因指掌自伸改為「了拳」。自幼即有佛緣，早歲出家，受陰那之勝，住山三十餘載。師長而每有異跡，尤因卓錫成井、禱雨即應諸事，鄉人德之。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圓寂，鄉人感師靈異，因共捐金建聖壽庵以祀之，至今已歷一千一百多年。

明洪武十八年(1385)，粵東監察御史梅鼎巡查粵東，道出程江、灘水洶湧，幾至覆溺，賴慚愧大師顯靈護舟，遂捐俸擴建殿宇，並更名靈光寺。相傳今寺門石匾「靈光寺」三字乃梅鼎手筆。

至道光十四年(1834)，寺僧廣緣重修山寺。又至咸豐八年(1858)，邑士人官紳重修廟宇並增補續刻寺志。

《陰那山志》作者李士淳，號二何。總角能文，下筆千言立就，為弟子員。讀書陰那，嘗引范文正「先憂後樂」之語以自砥礪。弱冠中萬曆己酉三十七年(1609)解元；崇禎元年戊辰(1628)中會元，殿試中劉若宰榜第十八名進士。授山西翼城知縣，惠民訓士，朔望詣明倫堂集諸生講學課文，捐俸建翔山書院，一時文風丕振。以治行卓異，召入對策，稱旨，授翰林院編修。晚年又創耆英書院，以讀法造士，學者宗之。修邑志以備文獻，著有《陰那山志》、《三柏軒集》、《燕台近言》、《素言》、《逸言》、《質疑十則》、《詩藝》、《古今文範》等，年劬而篤學。壽至八十一卒，崇祀鄉賢（參道光《廣東通志》、光緒《嘉應州志》本傳，胡曦：《梅水匯靈集》，陳珏：《古瀛詩苑》）。

明天啟元年(1621)出版的《陰那山志》有修纂者李士淳的〈序〉，記述了出書的因緣：「程鄉之陰那，自唐僧慚愧開山，今幾一千年。記載無聞，缺焉至今，使夫山色佛靈堙塞弗彰，吾黨赧之。江右釋子真蓮潛處此山，發心請藏，募緣刻志，為四方羔雉資。蔡薇省捐金首倡，而是集適成。」

本版印本早已不存，對該版之樣式與內容無由詳識，而至今傳世的《陰那山志》仍保留有李士淳的一些文章，如〈慚愧祖師傳〉、〈登五指峰記〉、〈重修靈光寺募緣序〉、〈陰那山造橋募緣疏〉、〈陰那山靈光寺山場田地碑記〉等，還有他與時人的一些楹聯，可能還有自北宋蘇軾至明末以來有關陰那山的題詠。由此可以大體瞭解明版《陰那山志》的內容。以上這些資料記錄了慚愧祖師的家世、生平，開山的經過，有關的人物、事件，雖則較為簡略，卻保存了陰那山及靈光寺早期的歷史，具體反映了由唐代至明代梅州地區社會及佛教發展的狀況，彌足珍貴。

入清以後，後人多次翻印或是續修補刻，增加了許多內容。可惜這些《陰那山志》基本上都失傳了，現在能找到的完整的印本，只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珍藏的孤本。該志只能確定是刊於光緒六年(1880)之後，具體出版年限未詳。內封頁題「靈光寺藏板」；隨後是明天啟元年(1621)作者李士淳〈序〉；卷首山圖後有道光元年(1821)李閩中〈陰那山圖後記〉云：「閩新繪寺圖，增入志內。」文前題簽署「咸豐丁巳七年(1857)仲秋月新增」；後又有「辛酉(1861)翻刻」字樣；書中卷二後有同治元年(1862)李閩中〈跋〉；〈跋〉後記事有遲至光緒六年(1880)者。書的末卷為〈審斷佛山全案〉，是康熙年間關於陰那山靈光寺山場地產主權紛爭官斷文告的史料匯集。也是清代增補的重要內容。

《陰那山志》在天啟成書，至清光緒六年(1880)所歷約二六〇年，有清一代，後人多次增補翻刻，所添加的內容相當豐富，有歷朝關於靈光寺田地山林歸屬、捐稅規定、治安穩定等公牘碑文，官紳士庶贈送的匾額楹聯、文人墨客的題詠墨寶等等，對於陰那山、靈光寺的歷史，是非常重要的資料，極具價值。

不過，由於《陰那山志》之增補，是由不同的人士先後進行，眼界不等，致令全書體例不一，文字記述不乏錯訛矛盾之處；目錄凌亂，內文增刪未能相應對照改變。因此，重新調整、理順全書順序，重編目錄以與內文對應，統一全書體例，這是本次整理點校相當重要的內容。經整理後的《陰那山志》目錄如下：

書前新增李虹畫彩墨陰那山、靈光寺圖十幀，鍾東〈前言〉。

明李士淳〈陰那山志序〉。

新增陰那山全圖。

靈光寺全圖。

陰那山全圖後記（附《冊志》載〈陰那山〉）。

上卷：

卷一：傳、記、序、引、疏、跋、銘。

卷二：山場田地、租銀錢穀。

卷三：題詠。

下卷：

卷四：楹聯。

卷五：匾額。

卷六：審斷佛山全案。

此書由鍾東點校，書前有李虹彩墨山寺圖十幅，鍾東撰〈前言〉，北京中華書局於二〇〇六年出版。出校記五十七條。

7. 曹溪通志

查《曹溪通志》版本源流情況如下：

- (1) 嘉靖刊本《南華志》，不存。
- (2) 萬曆七年(1579)《重修南華志》，不存。
- (3) 萬曆三十年(1602)《曹溪通志》，存。
- (4) 順治增修本《重修曹溪通志》五卷，存。
- (5) 康熙《重修曹溪通志》八卷，存。
- (6) 道光《曹溪通志》重刊本，存。
- (7) 民國《曹溪通志》再重刊本，存。

《曹溪通志》是南華寺志書，寺為禪宗祖庭，志在道脈源流，故名。明萬曆年間釋德清修。清康熙年間馬元、釋真樸重修。

曲江曹溪南華禪寺是禪宗六祖大鑒祖師道場，歷史悠久，影響深遠。南華寺之志書，近四百年來稱《曹溪通志》。因何不類他寺統稱寺志？其實，此前之南華寺志書，亦稱《南華志》。光緒《曲江縣志·釋書》曾介紹歷史上出現過的南華寺的志書：「《重修南華志》明黃城、曾旦撰，未見。《曹溪志四卷》明釋德清撰，未見。《南華志四卷》明符錫撰，佚，見黃《通志》。《南華志》明龔邦柱撰，佚，見《嶺南文獻》。《曹溪通志八卷》國朝馬元、釋真樸修，劉學禮重刊，存。康熙辛亥修，道光丙申重刊。」

此記載人事混淆，時序顛倒，令人困惑。現據有關史實將曹溪南華寺志成書始末分述如下：

自六祖惠能弘法曹溪，此地遂成禪宗祖庭，天下禪者如水赴壑，法乳一滴滋潤神州，影響可謂廣大深遠。而這樣一座名剎，直至明代嘉靖朝，「顧未有志以傳其盛者」。（明黃城：〈重修南華志序〉）

嘉靖初，有志於此者方著手其事。嘉靖四年乙酉(1525)，廣東參政羅僑開始收錄南華寺有關碑銘以及題詠詩文，並刻印留存。嘉靖二十一年壬寅(1542)，參議徐九皋下令韶州府，以羅僑收錄刊刻的史料為基礎修撰《南華志》，由當時的府學訓導龔邦柱編纂。與此同時，嘉靖十七年至二十二年(1538-1543)，符錫任韶州知

府，《南華志》之修撰即在其任內。由此可知，《曲江縣志》所記符錫修《南華志四卷》與龔邦柱編撰之《南華志》其實就是同一種書，由知府符錫主修，學訓龔邦柱編纂。光緒《曲江縣志》分別從嘉靖《廣東通志》及明張邦翼輯《嶺南文獻》輯錄《南華志》資料，不加辨析說明，易致誤會為二書。本版《南華志》失傳。

至萬曆十年(1582)前後，南韶道沈植得知《南華志》所載有所缺遺，乃屬韶郡名士黃城、邑博曾旦增補該志，重加修飾，付梓出書，名為《重修南華志》。《重修南華志》至今亦失傳。而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釋德清出版《曹溪通志》前，南華寺猶有該寺之志書在，據明周汝登〈曹溪舊志序〉：「余作禮既竟，聿詢掌故，僧持呈示，而余嗟未稱意。」（見道光《曹溪通志》重刊本）而這些「未稱意」的掌故史料，無疑必然會收存《曹溪通志》之中。前人草創之功，殆不可沒。

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釋德清重修南華志書，更名為《曹溪通志》，凡五卷，有萬曆二十六年(1598)兩廣總督陳大科〈序〉，次年吏部右侍郎楊起元〈序〉、萬曆三十二年(1604)雲南布政使司左參議周汝登〈序〉。該版刻本至今存世。至清順治七年至十八年間(1650-1661)有《重修曹溪通志五卷》，據著錄為「明萬曆刊，清順治增修本」（駱偉主編：《廣東文獻綜錄》），今存。

康熙十一年(1672)，馬元、釋真樸有《重修曹溪通志》八卷。卷首有康熙十年韶州知府馬元〈序〉，次年肇慶知府史樹駿〈序〉。該刊本傳世至今。

道光十六年(1836)曲江貢生劉學禮有《曹溪通志》重刊本，在康熙版《重修曹溪通志》中加劉學禮〈跋〉。刊本存。

民國二十一年(1932)張日麟等再重刊《曹溪通志》，在道光版的基礎上再加張日麟、黃烜林、釋吉祥、張維均諸人〈序〉、〈跋〉共五則。該刊本存。

以上乃近五百年來南華寺志書修撰增續、書名變易、興廢不常、緣來即刊的過程。

憨山德清所創、釋真樸重修的《曹溪通志》是現存嶺南古寺志中很有特色的一種。如果說由清初著名的詩文大家澹歸和尚、成鷺和尚所修的《丹霞山志》、《鼎湖山志》其中詩賦辭章英華吐馥，酣暢淋漓，令人嘆為觀止；由滿腹經綸、情耽山水的宰官孫繩祖、主僧鑑傳所修的《禺峽山志》、《華峯山志》清新秀麗、沁人肺腑，如同異彩紛呈的山水卷軸，令人目不暇給；而作為禪宗祖庭志書的《曹溪通志》，則以濃墨重塗，記述了南禪一脈的源泉及興衰起伏的發展過程，如同深沉厚重的歷史長卷，令人掩卷遐思。

憨山大師是明代聞名全國的高僧大德，道風高古，學識淵博，著作等身，中興曹溪之餘，憨山並為南華寺撰修志書，書名不依常例，改寺志為通志，「蓋曹溪為天下禪宗本源之地，若洙泗云」。「故其所取不獨區區尺寸之地，所記又不止目前變幻山水而已」，「其志不在山水而在道脈，故曰通志」（道光《曹溪通志·凡例》）。志不名「南華」而採「曹溪」，蓋「南華」之名為宋初太祖開寶元年敕額，此前歷名「寶林」、「中興」、「法泉」，「南華」未能概全也。而「志曹溪者，從山也，舉山而建制備矣，故以名志」（道光《曹溪通志·凡例》）。單從南華志書取名，便可體現禪宗祖庭之雍容氣度、卓爾不凡，更見憨山大師胸次豁達，目光高遠，超凡入聖。

康熙版《重修曹溪通志》由馬元、真樸重修。馬元，遼東籍北直隸真定人，康熙九年(1670)任韶州知府，明年序《重修曹溪通志》，又明年主修《韶州府志》。馬元「性嚴明，精勤敏練，案無留牘，訟至立決。兵燹後禮教未興，加意作人，月命題課士，品質無爽。擇耆儒行鄉飲酒禮，環橋擁觀，民知進德。巡視東嶽城隍及四賢王公諸祠，湮壞者或修或建，無廢不興」（見同治《韶州府志·宦績錄》）。釋真樸，字雪樵，漳州徐氏子，舉人，木陳道忞禪師弟子。除應馬元之請重修《曹溪通志》外，真樸還記錄編次其師木陳道忞的答問及雜文，刊刻《弘覺禪師北遊集》。晚主南華寺席，工書善詩，《法性禪院倡和詩》有其〈蒼葛樓納涼〉一首。《重修曹溪通志》卷二收有雪樵和尚說法〈語錄〉四則。《曹溪通志》之重修在康熙十年(1671)，距初版之萬曆三十二年(1604)近七十載，其中經歷明清改朝換代、兵燹動亂的階段，真樸除了對原志的結構、內容作了調整增刪，更重要的是增補了上述階段的歷史，保留了明清之際嶺南，特別是粵北地區政治、軍事、宗教、文化諸方面的珍貴史料。真樸還邀請當時一些富有學養的士宦名流參與《重修曹溪通志》的校訂，其中有清初名僧今釋澹歸，進士、南雄知府陸世楷，進士、肇慶知府史樹駿，舉人、曾纂修《曲江縣志》的曲江知縣周韓瑞，歲貢、仁化知縣鹿應瑞等等。經過這批專家的審訂，《重修曹溪通志》可稱更上層樓，錦上添花，它所保存的南華禪寺創建、發展的歷史紀錄，對粵北、嶺南乃至中國的禪宗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

道光《曹溪通志》正文前題「三韓馬元子貞、古閩釋真樸雪樵重修，曲江劉學禮修五重鐫」。卷首有馬元〈序〉，史樹駿〈序〉，舊志陳大科、楊起元、周汝登三〈序〉；凡例；劉學禮〈跋〉（該跋在整理本中移至全書最後）；重修姓氏；目

錄；圖志。卷一，山川形勢、建置規模；卷二，道脈源流、傳燈人物、繼席宗匠、佛法提綱；卷三，王臣外護之上、之中；卷四，碑記類、引；卷五，塔記類、碑銘類、銘類、跋類、塔銘類、疏類、啟類；卷六，王臣外護之末、書類、實錄類、法語類、偈類、傳贊類；卷七、卷八，品題詞翰。

本次整理以道光十六年(1831)懷善堂版《曹溪通志》作底本，參校民國二十一年(1932)《曹溪通志》重刊本。

此書由楊權、張紅、仇江點校，仇江撰〈前言〉並撰《嶺南名寺志·古志系列叢書跋》，香港夢梅館於二〇〇八年出版，浙江富陽華寶齋古籍書社印刷。共出校記二十五條。

（二）《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

明末清初是嶺南禪宗發展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明末四大高僧之一憨山大師越嶺南來，弘宣佛法，中興曹溪祖庭，推動了禪宗在嶺南地區的傳播發展；曹洞宗高僧無異元來的兩位高足——棲壑道丘和空隱道獨返粵弘法，他們德才兼備，道風高古，及門弟子多為佛門龍象，僧材濟濟；加之明清易代，嶺南一地「十年王謝半為僧」（何鞏道：〈元夕坐西山草堂感舊詩〉），許多不甘異族統治的前明官紳士人紛紛進入佛門，大大加強了佛門的力量，提高了僧眾的素質，擴充了佛教對社會的影響。部分原先深受儒家文化薰陶、出家後又受到禪學思想影響的遺民僧，身入空門而又不能忘情世事，乃循習以文字寄託情懷，宣洩鬱結，寫下許多旨趣有別的詩文集。這些作品與同時的許多大德的語錄、經解都是中國佛教文獻的組成部分，同為嶺南文化的寶貴財富。在清初順治、康熙兩朝約八十年的期間內，在各方面因素影響下，因緣湊合，風起雲湧，嶺南的禪宗得到很大的發展，達到了唐朝六祖以來第二個高峰。正如陶乃韓先生所云：「不論是其教徒之數目、規模、層次，還是其弘揚佛法的熱忱，或者是其叢林之建設、著述豐富方面，都相當引人注目。」（〈大乘菩薩道精神在明末清初的落實與發展——以天然一系在嶺南（廣東）的發展為例〉）這樣大的題目，本文不可能多加論述，只是從以上引文中最後一小點——「著述豐富」引申說明一下。

冼玉清(1895-1965)，中山大學教授，傑出的女詩人，廣東文獻專家。她的力著《廣東釋道著作考》蒐集了上世紀五十年代仍存世的廣東釋道著作，網羅豐富，考訂詳確，是瞭解、研究廣東宗教不可或缺的工具書。至今時逾半世紀，先生當年

敘錄的有關著作，只會逐漸消失，不可能再增加，更顯現出先生此書之可貴。

現將《廣東釋道著作考》中有關釋家著作的資料統計整理，可得唐、宋、元、明、清各朝僧侶、居士之著作人數及著作數目，列表如下：

項目 朝代	著作人數	著作數目	備註
唐	惠能等 7 人	23種	
宋	子璿等 4 人	8種	
元	宗寶等 2 人	2種	
明	德清等 5 人 附楊起元等 5 人 } 10人	61種 6種 } 67種	
清	牧原等 74 人 附徐作霖等 6 人 } 80人	192種 6種 } 198種	《丹霞雪詩》作者為天然，古翼非作者，故作者人數減去一人，而著作數目不減。
總計	103人	298種	下面一欄，單列「清初」一段時間的著作人及著作數目。
清初	牧原、徐作霖等 57 人	174種	「清初」指清順治至康熙年間(1644-1722)大約 80 年。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作三組對比：

1. 「清初」與整個清朝著作人與著作數的對比：

57 人／80 人， 清初占 71% ，超過七成。

174 種／198 種， 清初占 87.8%，接近八成八。

2. 「清初」與唐、宋兩朝總數之比：

57 人／11 人， 清初著作人數為兩朝的 5.18 倍。

174 種／31 種， 清初著作數目為兩朝的 5.6 倍。

3. 「清初」與唐、宋、元、明、清五朝之總數比：

57 人／103 人， 清初占五朝總人數的 55%。

174 種／298 種， 清初著作數占總數的 58%。

由此可見，清初這八十年確實是不同凡響的階段，短短幾十年，著作人竟超過五朝

一二九三年總數的一半，著作數竟占 58%，可見當時著述之大量、普遍，僧材之眾多、興盛。雖然古代文獻的存世與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存世的多少、有無，畢竟還是有一定的規律。因此，依憑洗玉清先生所著錄的嶺南佛門著述之數目，以其數量變化作為宗門興盛的標誌之一，還是有重要參考價值的。

有感於此，我們籌劃出版《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以便於相關的研究者參考。

中山大學歷史系蔡鴻生教授對此項工作非常重視，親自為《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撰寫〈總序〉。他以澹歸和尚為例，指出這套叢刊的意義：「透過歷史的迷霧，可知包括《徧行堂集》在內的僧徒著述，凝聚著豐富多彩的因緣：佛緣、世緣、學緣和翰墨緣。這批歷劫倖存的嶺南僧寶，不僅是『桑海換』的歷史紀錄，也是『典型存』的文化象徵，非同凡響。」

清初嶺南高僧、名僧輩出，著述繁多，根據我們的認識理解，品次先後，列出兩輯書目：

第一輯（四種）：

函昞《瞎堂詩集》、今釋《徧行堂集》、成鷲《咸陟堂集》、大汕《大汕和尚集》。

第二輯（十四種）：

函可《千山詩集》；今無《光宣臺集》；二嚴《嘯樓前、後集》；徐作霖等《海雲禪藻集》；弘贊《木人剩稿》、《觀音慈林集》、《六道集》、《兜率龜鏡集》；一機《塗鴉集》、《塗鴉集雜錄》；開瀉《鼎湖外集》；道忞《布水臺集》；願光《法性禪院倡和詩》。

如今，第一輯四種已經在今年八月出齊，第二輯的整理亦在進行中。茲對已經出版的四種書作「敘錄」如下。

1. 瞎堂詩集

《瞎堂詩集》二十卷，清釋函昞著。

明末清初嶺南著名詩僧函昞，字麗中，別字天然，號丹霞老人。俗姓曾，名起莘，字宅師，番禺迳徑村人。少穎悟，負才名。年十三，入私塾。年十七，補諸生，與里人梁朝鍾、黎遂球、羅賓王等交遊，相與縱談時事，以康濟為己任。此時他於佛教雖知慕宗乘，但以因果之事為虛誕，仍心在科舉，於崇禎六年(1633)中舉

人。九年詔舉賢良方正，得兩廣總督熊文燦舉薦，後世稱「名孝廉」。十三年(1640)上京應試，不第，舟次南康，入廬山歸宗寺，求道獨和尚削髮為僧，法名函昞。十五年(1642)省親廣州，應士紳陳子壯等延請，開法訶林（光孝寺）。明亡，曾一度避亂西樵山。又入番禺雷峯隆興寺（後改名海雲寺），旋移廬山棲賢寺，歷主華首、海幢、丹霞諸剎法席。康熙二十四年(1685)卒於雷峯海雲寺。「瞎堂」，就是這位被後世譽為清代嶺南佛門精神領袖的和尚住海雲寺的方丈室名，也是他的終老之所。

函昞以「名孝廉」盛年棄家，時人多異之。他的出家先是個人行為，而後竟成其家族的集體行為，他的父、母、妻、子、媳、妹一門六口及一些堂兄弟都先後投身佛門。清初政治的壓迫和種族的摧殘，使得寺院一時間成了社會各色人等避亂和了脫生死的一大去處，逃禪之風大煽。那些當初對曾氏棄儒向佛之舉頗以為怪的人，才開始理解並欽服為先見。為給世人受傷的生命及靈魂以安慰、指引，在追尋佛性光明的歷程中，天然禪師收羅僧眾、整飭禪風，表現了他的大實行。他為提持佛法，勤於著述，法乳廣布。據汪宗衍《天然和尚著述考》及洗玉清《廣東釋道著述考》，函昞著述大略有《楞伽心印》四卷，《首楞嚴直指》十卷，《金剛正法眼》、《般若心經論》一卷，《天然昞禪師語錄》十二卷，各剎《語錄》，《禪醉》，《焚筆》，《天然和尚梅花詩》，《丹霞天老人雪詩》，《丹霞天老和尚古詩》，《丹霞詩》，《天然和尚同住訓略》一卷，《瞎堂詩集》二十卷等。

明末清初嶺南詩僧眾多，詩集大量印行，這是個頗為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何桂林〈蓮西詩存序〉云：「大率明季甲申、丙戌之遺老而逃於禪者多，如憨山之有《夢遊集》，空隱之有《芥庵集》，正甫之有《零丁山人集》，天然之有《瞎堂集》，祖心之有《千山集》，阿字之有《光宣臺集》，石鑑之有《直林堂集》，訶衍之有《鶴鳴集》，真源之有《湛堂集》，仞千之有《西臺集》，樂說之有《長慶集》，澹歸之有《徧行堂集》……」又云：「百餘年來，悉以海雲為宗，海幢為派。」在這所有的詩僧和別集中，作為詩僧導師的函昞及其《瞎堂詩集》的崇高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瞎堂詩集》分二十卷，共收詩一七一九首，在總數萬餘首的清初嶺南僧詩中，巍然為一大家。瞎堂詩題材廣泛，而主要在反映干戈離亂中的悲情民生，哀悼為國死難的戰士，歌頌師弟、同志情誼，以及讚美佛法、抒寫禪意等幾方面。就文體風格來說，函昞詩一如其人，平易清雅，而不失血性。

函昷詩眾體皆備，這與他的作詩目的是密切相關的。他不但創作大量的詩文，而且在丹霞、雷峯等處組織文社，集合和訓練僧眾。其高徒澹歸在〈王說作詩集序〉中說：「雷峯（函昷）雖提持祖道，然不廢詩，士之能詩者多至焉。」論者稱，天然門下可能集中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詩僧集團」。其弟子中多有文士、諸生、舉人甚至進士出身者，學問修養頗深。

函昷相容了文士和禪師雙重文化優勢，他以詩團結、培養僧人，既振興了佛法，亦在詩國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足跡。其弟子最為著名者有所謂「十今」，「今」字輩以下再傳弟子及俗家弟子許多是通詩者，有些在詩壇上頗引人注目，如屈大均、陳子壯、黎遂球等。在他的感召和培育下，出現了所謂「海雲詩派」。其俗家弟子徐作霖、黃蠡等編纂《海雲禪藻集》，選取了天然以下「今」、「古」、「傳」三代詩僧、居士一百二十餘人有關天然和尚及海雲寺的詩作合一千餘首。此書的編輯印行，標誌著「海雲詩派」的形成，並逐漸得到詩界的認可。

《瞎堂詩集》的編纂者今毬，字雪木，東官尹氏子，生於崇禎十五年（1642），童年孑身雷峯為沙彌，隨函昷七住道場。為人耿介，居約甘菲，不肯低眉仰面一人。《瞎堂詩集》卷十八有〈雪木毬禪人凡與語或自有所陳輒見動色為解嘲戲示詩〉、〈雪木書記同鑑光行乞臨川二首詩〉，中有「為道相隨二十年」、「支援大廈先一木」云云，可見函昷對小徒的愛重。《海雲禪藻集》載有今毬詩六十首，其中有〈挽本師天老人詩〉三首。編纂《瞎堂詩集》對於今毬來說，無疑是對先師的最好紀念。

函昷的詩集留存至今，經歷過如下幾個過程：

- (1)《似詩》，順治、康熙年間刻本。函昷生前手編。
- (2)《天然老人梅花詩》，清康熙年間刻本。中山大學、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有藏。
- (3)《丹霞天老人雪詩》，清康熙刻本。杭州市圖書館藏。
- (4)《天然昷禪師語錄》，清康熙刻本，後入《嘉興藏》。今辯編，卷十二附梅、雪詩。
- (5)《瞎堂詩集》，海雲寺康熙刻本。天然老人示寂後，弟子今毬取天然未刻詩稿及傳世單行本《天然老人梅花詩》、《丹霞天老人雪詩》與《似詩》匯刻一集，更名《瞎堂詩集》，為二十卷，移錄函昷《似詩》的〈自序〉為之序，並在序末加注云：「老人生平吟詠之意，已盡於是。讀者玩索之，不唯老人之詩可悟，即老人

之人亦可得。故全集編定，即錄以為序。」重編詩集收錄詩作數量大大溢出《似詩》。從書末所附錄的捐資人員名單題為〈重刊《長慶語錄》、《千山詩集》、《瞎堂詩集》捐資列名〉看，《瞎堂詩集》是和道獨《長慶語錄》、函可《千山詩集》一同重刊的。

按以上二種，乾隆四十年因丹霞澹歸文字獄案發，被奏「集中多狂誕之語」，與澹歸《徧行堂集》一道，皆列入禁燬書目，版片被銷毀。

(6)《瞎堂詩集》，道光海幢寺重刻本。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有藏。此版刻印精良，書品甚佳。卷首有天然和尚像、張維屏撰像贊、自序、湯來賀撰〈天然和尚塔志銘〉等，書末附錄捐資付梓人員名單。

(7)《瞎堂詩集》，道光海幢寺刻本重印本。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有藏。該書與道光本同一版片，惟書末附錄捐資付梓人員名單多出數人。

(8)《瞎堂詩集》，一九七六年何氏至樂樓影印清道光海幢寺刻本，編入《何氏至樂樓叢書》第十三種。何耀光〈自序〉云：「諸師撰述宏富，經注語錄，咸納《嘉興藏》、清《龍藏》及《日本藏》中，而天然、剩人二師尤以詩名。曩予得重印剩人《千山詩集》行世，欲求天然《瞎堂詩集》，曠時未獲。適承周君理堂見告道光重刊初印本，銀觸舊懷，亟從瓴假。」又云：「道光間海幢寺重刻，今亦罕見，亟謀影印，實吾叢書中。」卷首有廣州海幢寺藏「天然和尚遺像」影印件一。

(9)《瞎堂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本。此本據北京大學藏本影印，但影印質量欠佳，偶有脫漏模糊，顯是先複印後據以影印者。

按以上數種實出於同一底本，即道光海幢寺刻本，而裝幀少異。書前的天然和尚像及張維屏撰像贊，或有之，或無之；和尚像或彩繪，或線勾。書末附錄捐資刻印名字者，多為華首臺、海雲寺、海幢寺、大佛寺的常住及僧眾。可見，儘管《瞎堂詩集》在乾隆年間被列入禁燬書目，初刻版片被焚毀，但印本尚藏之高閣，一旦弛禁，即翻刻重印。

此次整理，以中山大學圖書館藏道光海幢寺刻本為底本，參校梅、雪詩單行本及《天然和尚禪師語錄》，加以標點和簡單的校勘，校記統附全文之後。出校記四十九條。

正文卷首天然和尚畫像；次張維屏〈天然和尚像贊〉；又次天然道人〈自序〉、今毬〈小啟〉、湯來賀〈天然和尚塔志銘〉。

正文目錄：卷一，古歌謠、風雅體、騷體；卷二，樂府；卷三至卷五，五言古

一至三；卷六，五言古四、七言古；卷七至卷九，五言律一至三；卷十至卷十六，七言律一至七；卷十七、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一；卷十八，七言絕句二；卷十九，梅花詩；卷二十，雪詩。校注。

此書由李福標、仇江點校，書前有蔡鴻生〈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總序〉、整理者〈前言〉，清釋函昞〈自序〉，中山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出版。

2. 徧行堂集

《徧行堂集》，清初嶺南名僧今釋澹歸著。

澹歸 (1614-1680) 俗姓金，名堡，字道隱，又字衛公，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金堡幼年即穎悟絕倫，有神童之目。為諸生時，孤介曠遠，不屑為時名。弱冠已博通群書，熟知天下利病。文筆清堅，度越蹊徑。

崇禎丙子 (1636) 舉於鄉，崇禎庚辰 (1640) 成進士，授臨清知州。頗有政聲，因得罪上司，被迫引疾去職。順治二年 (1645)，清軍下杭州，金堡偕原都督同知姚志卓起兵抗清，勢孤而敗。唐王自立於福建，號隆武帝，金堡脫身出走，入閩獻策直言，除兵科給事中，因服母喪，堅辭不受。隆武帝死，桂王在廣西自立，號永曆帝。永曆二年 (1648)，因瞿式耜薦，金堡赴肇慶行在，仍授兵科給事中，司諫職，即上疏抨擊時政，彈劾專恣權臣，以「直臣」著稱。永曆小朝廷內部黨爭異常激烈險惡，金堡為楚黨「五虎」之中堅，自未能倖免，下錦衣獄，備受酷刑，黜戍清浪衛（今貴州省岑鞏縣境內），中途會清兵至，押解之人逃竄，金堡得瞿式耜之助，留居桂林。因頹局勢不可挽，左足創攣已成殘疾，遂絕意世事，削髮為僧，初取名性因，順治九年 (1652) 投南粵函昞和尚門下，始名今釋。

金堡本是徧急耿直，以才幹自許的官僚士大夫，最終遁入空門，與那個特殊時代的部分知識分子一樣，也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他自己就曾直露地表白道：「吾輩舍此一著，別無解脫之方也。」（《徧行堂集（前集）·與陸麗京學博》）「於世出世間，吞過幾許辛酸苦汁，今雖為丹霞所累，亦比世累較輕。」（《徧行堂集（續集）·與朱廉哉明府》）天然函昞乃曹洞宗第三十四世傳人，開清初嶺南僧流詩書風雅之氣，門下精英薈萃，傳法高弟十人，號稱「十今」，澹歸今釋為第四法嗣。順治十八年 (1661)，澹歸得李永茂、李充茂兄弟所捐捨之仁化丹霞山，創建別傳寺，胼手胝足，廣結善緣，不憚煩人事糾葛，經營五年，別傳寺遂成為屹立南

粵的大剎。於是迎天然和尚為住持，自為監院。鼎盛時，山中竟聚僧眾近二百人。至康熙十年(1671)，天然和尚赴廬山歸宗寺，三年後，澹歸始正式主持別傳寺法席。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澹歸出梅關，走嘉興請《藏》，往返於當湖、平湖、雲間、吳門、半塘等地。十八年(1679)四月，遣僧徒將《藏經》奉回丹霞，衰年扶病，雙腿浮腫，雖欲覓一靜室安處，終未能如願，遂一瓢一笠，隨緣去住。十九年(1680)春至平湖，假楊故交、前南雄太守陸孝山之南園，病甚伏枕，八月九日示寂。

歷來有論者不屑於澹歸的走州撞府，唱酬奉迎，以為於其節操清名有損，澹歸因此多受爭議乃至毀貶。殊不知以一殘病人之力，要想在亂世中存危拯溺，談何容易！澹歸僅憑筆墨詩文換取山中生存之所需，養活僧眾，自己從無分文積蓄。兵亂時，丹霞山實際上成了僧侶與貧民的避難之所。風燭殘年之際，刪刻《徧行堂集》，其主要目的，也是為了換取「叢林抄化資糧」，「儘是化主一片榔鈴聲」。而最可注意的，還是澹歸本人的節義觀、生死觀以及特異的行事風格。一方面，他是當時士大夫避世逃禪之風的踐行者；一方面，他又是獻身佛教力化世俗的苦行僧。這看似矛盾，卻在澹歸的傳奇經歷中得到統一。以天下蒼生為念，便不以名節自居，不恃隱遁為高，其與清廷官員接觸，絕不空談義理，反頗注意時事，不忘拯民於饑溺，在能力範圍內為民喉舌，三百年來，嶺南百姓對他的愛戴紀念由來有自。

澹歸生平著述頗富，屢遭禁燬滅裂，多已不可復見。僅據清代《禁書總目》著錄，即有《丹霞初、二集》、《臨清來去集》、《行都奏議》、《粵中疏草》、《梧州詩》、《夢蝶庵詩》、《徧行堂雜劇》、《今釋四書義》、《金堡時文》、《明文百家釋》等共十種，除《今釋四書義》收在《徧行堂集》外，其他九種皆因禁燬而不存。今存世尚有：

(1)《徧行堂集》（正集四十九卷、續集十六卷），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

(2)《嶺海焚餘》三卷，係作者仕宦南明永曆朝的奏疏，計四十九通，民國張鈞衡得舊抄本，刊入《適園叢書》，得以流布。已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

(3)《丹霞日記》一冊，不著撰人名，鈐澹歸、今釋二印，蓋康熙十六年(1673)秋冬間日記，今藏澳門普濟禪院。

(4)《元功垂範》二卷，此書為平南王尚可喜年譜，確由澹歸審訂（見《徧行堂集（前集）·上平南王書》），終不免為其一生招訾之玷。今有廣州中山圖書館

一九五七年針筆重寫本。

另有《徧行堂尺牘》五卷、《徧行堂詩集》二卷、《徧行堂詞》三卷、《菩薩戒疏隨見錄》一卷，皆由《徧行堂集》抄出單行，非另有一書也。

《徧行堂集》，包括前集（又名正集）四十九卷，續集十六卷。禪師世壽六十有七，僧臘二十有九，所收詩文，大約起於清順治九年、即明永曆六年（1652），迄於康熙十九年（1680）作者逝世，實乃禪師佛門生涯的完整記錄。據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清代文字獄檔案》第三輯，《徧行堂集》數番由乾隆欽定為「語多悖謬，必應毀棄」的禁書，甚至連其墨蹟碑石亦不容存世，一律「椎碎推仆，不使復留於世間」。今觀集中，並無直接針砭清室的文字，作者生前曾將一些「語涉激憤，不宜廣示於人」及「不和平」的內容刪除（《徧行堂集（前集）·與陳季長太史》），顯然已有意迴避。但是作為一個明朝遺民，一個舊政權的直臣，澹歸詩文中不可避免地會流露出故國之思和家國之恨，所謂「悖謬」文字，當然是指這些內容。除去大量的化緣闡道文字外，今天最值得珍視的是尺牘與記傳部分，其中記載抗清赴死的瞿式耜、何騰蛟、張同敞、李元胤、李永茂等人事蹟，篇篇「敘述沉痛，凜凜有生氣，故犯清廷之忌」（洗玉清先生語）。

澹歸因其所處時代之動盪變化，其人生平經歷之複雜特殊，別集內容龐雜豐富，涉及面極為廣泛，舉凡南明政治、明清理學、佛禪義理、文藝思潮，以及嶺南民俗都有反映。作為明清之際的著名詩人、詞人、書法家、高僧，其人其著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徧行堂集》的整理點校出版，對於晚明史、清初遺民史的研究，明清之際士大夫的思想史研究，禪宗發展史（尤其曹洞宗中興歷史）研究，乃至文學史、民俗史研究都有獨特而廣泛的學術價值及意義。早在二十世紀中期，陳寅恪、洗玉清等學者對《徧行堂集》已有關注與評價；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有著錄（僅著乾隆本）。香港吳天任著《澹歸禪師年譜》（其時尚未見《徧行堂集》前集），香港學者饒宗頤和日本學者清水茂曾綜論《徧行堂集》所見澹歸詞，肯定其在清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香港、臺灣及日本學界對此向有研究，但多就方以智研究入手，將澹歸作為其參照面，涉及較窄，尚未深入，主要原因是資料文本整理滯後，版本稀缺。近年來，國內關於澹歸其人其著研究之風漸成，但版本文獻的發掘整理尚未開始。

無論是作為特定時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還是以儒入釋的著名人物，金堡與方以智經歷相似，並享盛名，同是明清之際大變革時代思想開啟的先覺者。兩人是同

年進士，同仕南明政權，同皈佛教禪宗曹洞宗門下，同擅一代文名，方以智早已成為學術界的熱門研究對象，近年已整理有《方以智全書》，而澹歸別集、全集的發掘整理長期以來付之闕如，因而對澹歸的評價也是模糊而多有缺憾的。就學術研究的科學、全面、準確而言，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

該書原書諸序、引：李復修〈徧行堂集序〉、天然和尚〈序〉、釋今無〈序〉、趙佃〈舵石翁詩集序〉、釋今辯〈丹霞澹歸禪師語錄序〉、澹歸〈頌古自題〉、陸世楷〈徵刻徧行堂詩文引〉、澹歸〈徧行堂集緣起〉。又次《徧行堂集》目錄：卷一至卷二十九，文部；卷三十至卷四十一，詩部；卷四十二至卷四十四，詞部；卷四十五至卷四十九，語錄、佛事、頌古、菩薩戒疏隨見錄。又次為李復修〈徧行堂續集敘〉、釋今辯〈序〉、沈皞日〈序〉。又次《徧行堂續集》目錄：卷一至卷十二，文部；卷十三至卷十六，詩部。

原書序、引之作者簡介如下：

李復修，字（或號）謙庵，漁洋（秦漢時治所在，今北京市密雲縣西）人。康熙二十年（1681）作序時，在韶州知府任上。

天然和尚，法名函旻。明末清初嶺南名僧，澹歸和尚本師。

今無，字阿字，天然和尚第一法嗣，澹歸法兄。修建廣州海幢寺並任住持。

今辯，字樂說，天然和尚第五法嗣，澹歸法弟。歷主丹霞、海雲、海幢諸山。

趙佃，浙江平湖人，與澹歸、陸世楷有交往。餘待考。

陸世楷，字孝山，浙江平湖人，澹歸中表。任粵北南雄府太守時大力支助澹歸創建別傳寺。後禮天然和尚為師，法名今互，字悟石。

沈皞日，字融谷，浙江當湖人，陸世楷妹丈，曾住世楷南雄府邸，與澹歸為世外交。後亦禮天然和尚，法名今鐔，字智鋒。

此番整理點校《徧行堂集》，前集用《四庫禁燬書叢刊》本（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1740）刻本影印，四十九卷，目錄二卷）為底本，續集用香港佛教志蓮圖書館一九八九年刊本（據宣統三年上海國學扶輪社排印本影印，十六卷）為底本。又以廣東中山圖書館藏《徧行堂集》進行參校，一共二部，皆黃蔭普憶江南館藏本：

(1) 康熙二十年（1681）本《徧行堂集》，前集四十九卷（其中目錄一冊為手抄），續集十四卷。前集卷前八篇序、引皆相同，而目錄只有四十六卷，以「法語」終。卷四十七、四十八，版心題為頌古；最後附〈徧行堂集菩薩戒疏隨見

錄》，實為卷四十九。以乾隆本與康熙本對照，兩者版式完全一致，版心亦同款式同頁碼，甚至連頁面折痕，缺字黑方都一致，可見是同一版本，惟刊印時間不同耳。另外，乾隆本尺牘部分（卷二十一至二十九）有單獨目錄，而康熙本無尺牘目錄。至於續集，康熙本目錄共十六卷，與宣統本同，而正文止十四卷，缺卷十五、卷十六。可貴者，扉頁有「丹霞藏版」之印，卷首為李復修〈徧行堂續集敘〉，此敘乃康熙本之標證，他本所無，今據以補入，正文據以參校。

(2) 清抄本《徧行堂集》，實乃續集，十六卷，十二冊，未署抄者，內有缺失。卷二尾有冼玉清先生跋語：「此鈔本是從康熙本抄出，缺第一冊。62,12,27。」今據以參校，改正訛脫不少，附校記於各卷後。

此書由段曉華點校，並撰〈前言〉。原書有李復修、天然和尚、今無、趙佃、今辯〈序〉，陸世楷〈引〉，今釋澹歸〈自題〉、〈緣起〉，廣東旅遊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八月出版。

3. 咸陟堂集

《咸陟堂集》，分正、二兩集，《咸陟堂正集》，詩十七卷，文二十五卷；《咸陟堂二集》詩六卷，賦一卷，文八卷。清釋成鷺撰。

成鷺一生著述甚多，計有《楞嚴直說》十卷、《金剛直說》一卷、《老子直說》（又稱《道德經直說》）二卷、《注莊子·內篇》、《鼎湖山志》八卷、《鹿湖草》四卷、《詩通》、《不了吟》、《自聽編》，還有分量最重、篇幅最大的詩文集《咸陟堂集》。

至該集取名「咸陟」之因由，成鷺解釋道：「《周禮》太卜氏占夢之法，其夢有三：因思慮而致者曰『致夢』，思慮所不及者曰『觭夢』，無思無慮，感於物而通者謂之『咸陟』之夢。吾少也賤，多能鄙事，學為詩文，本乎家學，不由師說。著述經論，自成一家之言，不敢出以問世，恐見笑於大方。竊念萬法惟心，我無心而感物，物將從吾心以應之，『咸陟』之謂也，遂自名其堂曰『咸陟』，著述因而名焉。」（見〈紀夢編年〉）

該書卷首有山人小影，次自題像贊，又次楊權〈成鷺及其咸陟堂集〉。後有黃培芳道光二十五年〈重刻咸陟堂集敘〉，次胡方、鄭際泰、樂颯〈讀咸陟堂集題辭〉，次胡方〈跡刪和尚傳〉（以上敘、題辭、傳俱道光版增補）。又次〈自序〉。樊澤達〈序〉，李來章〈序〉，劉臨〈序〉，羅顥〈序〉。次目錄：《咸陟

堂詩集》，卷一至卷十七；《咸陟堂文集》，卷一至卷二十五。次吳琨〈跋〉，又次孫繩祖〈跋〉（此跋為道光版新增）。次附錄：〈紀夢編年〉、〈丁酉年後紀夢續編〉。《咸陟堂二集》：卷首石娥嘯〈序〉，次目錄：卷一至卷八，文；卷九，賦；卷十至卷十五，詩。次方曦光〈咸陟堂集跋〉；次〈重刊捐助姓氏〉；又次〈後記〉。

《咸陟堂集》收錄了成鷺一生不同時期的詩文作品，包括序、跋、志、銘、記、傳、壽文、祭文、題贈、書、啟、疏、引、說、尺牘、問答、警語等六二〇篇，還有詩賦一五三三首。成鷺作為親歷者，真切確鑿地記錄下當時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民生諸方面的情況，對於嶺南歷史特別是清史、宗教史的研究，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顯著者如其詩〈仙城寒食歌·四〉句：「海珠海水流腥血，十萬生靈冤莫雪。」擲地有聲，可稱詩史。時人及後世對成鷺的評價很高，他的摯友、嶺南著名學者胡方在〈跡刪和尚傳〉中稱：「其才以敏捷雄浩推倒一世，藝苑之士無與抗衡者。」沈德潛則稱成鷺：「所著述皆古歌詩雜文，……本朝僧人鮮出其右者。擬之于古，其惟儼、秘演之儔歟。」（《清詩別裁集·卷三二》）可證成鷺不愧為清初傑出的詩僧。

就今所見，《咸陟堂集》的版本有二：一為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康熙耕樂堂刊本；一為中山大學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所藏道光重刻本。

耕樂堂刊本有康熙四十八年（1709）樊澤達〈序〉，估計是在當年或稍後一段時間內出書，最遲不會超過康熙六十一年。該版只有正集，而《廣東通志》、《廣州府志》、《南海縣志》、《香山縣志》等志書關於《咸陟堂集》的著錄，多稱其有續集或二集，且所記卷數亦不一。

乾隆時文網嚴密，《咸陟堂集》亦遭禁燬，清〈禁燬書目補遺一〉稱：「《咸陟堂詩文集》一部十四本，書中多涉憤激，應請銷毀。」

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離乾隆禁書已近七十年，廣州華林寺僧明超、祇園尋找到一套康熙版的《咸陟堂集》，並在慨歎「惜乎（《咸陟堂集》）版片久已無存，藝林未由遍覽」（見〈重刻咸陟堂集敘〉）的著名詩人黃培芳等士紳的大力幫助下重刊《咸陟堂集》，重刊本在康熙版的基礎上，增補了原書出版至成鷺圓寂這段期間成鷺的新作，編為《咸陟堂二集》，其中有詩六卷，賦一卷，文八卷。同時增補了康熙間胡方、鄭際泰、樂灝的〈讀咸陟堂集題辭〉，胡方〈跡刪和尚傳〉，孫繩祖〈跋〉。正文則增加了〈南山研農傳〉等六篇文章。另外卷首還增加了黃培

芳寫於道光二十五年的〈重刻咸陟堂集敘〉，書後有成鷺俗家後人方曦光〈跋〉，並附〈重刊捐助姓氏〉。

這次整理，以康熙耕樂堂本及道光重刊本二集作底本，參校道光重刊本正集以及同版他本以補殘缺模糊之處。

此書由曹旅寧、蔣文仙、楊權、仇江點校，廣東旅遊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八月第一版。《咸陟堂正集》書前有楊權〈成鷺及其咸陟堂集〉（代序）。原書有黃培芳〈重刻序〉，胡方、鄭際泰、樂灝題辭，胡方〈跡刪和尚傳〉，成鷺〈自序〉、〈題辭〉，樊澤達〈序〉，李來章〈序〉，劉臨〈序〉，羅顥〈序〉，文後有吳琨〈跋〉，孫繩祖〈跋〉。《咸陟堂二集》卷首石娥嘯〈序〉，文後方曦光〈跋〉。書後有整理者〈後記〉。

4. 大汕和尚集

《離六堂集》十二卷，《離六堂二集》三卷，《潮行近草》三卷，《離六堂近稿》一卷，《海外紀事》六卷，合為《大汕和尚集》，清大汕和尚撰。

大汕(1633-1704?)，字石濂，亦作石湖、石蓮，號厂翁，亦號石頭陀。俗姓徐，江西九江（一說南昌）人，曾流寓江南，注籍浙江嘉興，故亦被稱為「吳人」。大汕學識淵博，下筆成文，能詩善畫，著作甚豐，又曾應邀至海外弘法，是清初嶺南著名詩僧。

大汕生於明崇禎六年(1633)，幼居吳中，家貧寒，十六七歲時皈依高僧覺浪道盛禪師，年十九剃度為僧。後雲遊修學，廣歷諸方，南度嶺表，得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與僧大韶等護法，入住廣州平南王尚可喜的家廟大佛寺。康熙十七年(1678)，大汕住持廣州長壽寺，並以清遠飛來寺為下院。康熙二十二年(1683)，大汕應邀訪友粵東潮州，途經惠州，東莞等地，盤桓數月，有《潮行近草》三卷行世。大汕早年受龔鼎孳、陳維崧等人的詩學啟迪，到嶺南後與屈、陳、梁等「嶺南三大家」詩書過從，頗受教益，漸崛起詩壇。屈大均稱道：「石和尚諸詩體物幽深，指事篤切。」「超然獨遠，婉而多風，蓋得《三百篇》之微者也。」「展卷讀之，自有一片雲行水流之致，是其以天勝者也。」（屈大均：〈離六堂詩序〉）康熙三十四年(1695)，大汕應聘前往越南順化弘法，受到當地王公大臣及信士民眾的信重。此行有力地促進了禪宗在東南亞的傳播，也為他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大汕晚年因官司被逐回注籍之地，途中卒於常州，時間應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當年或稍

後。

大汕富於才情，著作頗多，在康熙中數次刊印行世。據大汕《海外紀事》卷首之〈本師海外紀事序〉稱：「（大汕）著書二十餘種。」這批著作可分為「佛教」及「文史」兩類，茲將主要者分列於下：

佛教類：《語錄》十種，及《證偽錄》、《不敢不言》、《源流就正》、《問五家宗旨》、《客問》、《惜蛾草》。

文史類：《厂翁詩集》、《離六堂集》、《離六堂二集》、《燕遊詩》、《繪空詞》、《葉聲集》、《潮行近草》、《海外紀事》、《離六堂近稿》。

如今，大汕的佛教類著作都已失傳，最可惜的是其中的《語錄》十種，本來通過這批語錄，可以顯現大汕和尚的佛學造詣，對後人真切地認識這位名僧有很大的作用。至於其餘的著作，內容多是曹洞宗內世系之爭執，或是大汕與世俗人士交惡引起的攻訐，其中不少為意氣之爭者。

而文史類著作，留傳至今的有《離六堂集》、《離六堂二集》、《潮行近草》（不全）、《海外紀事》、《離六堂近稿》，占了有記載的書目的大部分。

失傳的有《燕遊詩》、《繪空詞》、《葉聲集》。其中《燕遊詩》出書在《離六堂集》之後，卷首有李方廣與毛際可分別作的〈厂翁燕遊詩序〉。後來再刊印的《燕遊詩》是否也收進該集，書中沒有提及，而從詩的內容看來，應該是收在其中了。至於《繪空詞》，以毛際可之〈序〉，當在康熙癸酉年（1693）出書，至今《繪空詞》失傳，但癸酉後出版的《離六堂集》把《繪空詞》的毛〈序〉放在「卷十二詩餘」之前，看來是把《繪空詞》也收到了集中。而《葉聲集》一書，只有黃登《嶺南五朝詩選》中「大汕」條提及，在其後書史中再未見記載，估計大汕的詩文著作，只有這一本是真正失傳的。

乾隆年間，大汕的《離六堂集》被列入禁書名錄，銷書燬版，其他著作自然受到牽連，能僥倖保存至今者，如鳳毛麟角。可幸的是，傳世的這些著作，都已收錄到該書《大汕和尚集》中，雖然小有流失，但通過這批詩文，也可對這位特立異行的名僧的學養為人有個基本的瞭解。

今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的廣州懷古樓刻本《離六堂集》、《離六堂二集》、《潮行近草》以及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收藏的《離六堂近稿》共收錄大汕所作詩詞歌賦約一千三百五十餘首。其中《離六堂集》收錄近九百首，《離六堂二集》收錄一百二十餘首，《潮行近草》收錄近九十首，《離六堂近稿》收錄二百四十餘首。

大汕的詩詞多次刻印傳世，最早的記載是康熙十六年(1677)張總為大汕詩集寫的〈厂翁詩集序〉，該書已失傳，或改名為《離六堂集》出版。

康熙二十三年(1684)，大汕的《潮行近草》刻印面世，吳綺、林杭學、馬三奇分別作序。

康熙二十六年(1687)，李方廣有〈厂翁燕遊詩序〉，次年毛際可亦為《厂翁燕遊詩》作序，內云：「師向有《離六堂集》。」可見在此前大汕已經刻印《離六堂集》傳世。亦可能是《厂翁詩集》以《離六堂集》之名刊行。

據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釋大汕」條稱，大汕所著《離六堂集》「刻于辛未」，即康熙三十年(1691)。

康熙三十二年(1693)，毛際可為大汕所作《繪空詞》作序云：「往錄《離六堂集》，以稱賦頌之雄，今著繪空軒空軒詞，猶駕宋元之妙。」估計《繪空詞》於是年出書。

康熙三十四年(1695)，大汕應邀往大越國弘法，次年年中返國，即準備將《離六堂集》再加整理出版，並徵求諸名士作序。當年(康熙三十五年)，至少有樊澤達為作〈離六堂詩集序〉，後來三四年間，再有高層雲、徐鉉、周在浚、陶煊等為《離六堂集》作序。出書時把原為《厂翁詩集》、《厂翁燕遊詩》、《繪空詞》所作諸序全部收入《離六堂集》序中，共十八篇。

康熙四十一年(1702)，大汕門徒法詮等將大汕近年詩作收集整理，刻印《離六堂近稿》附《離六堂集》出書。

可知大汕從康熙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677-1702)這段時期，先後多次刻印所著的詩詞，分別名為《厂翁詩集》、《離六堂集》、《厂翁燕遊詩》、《離六堂二集》、《繪空詞》、《離六堂近稿》。

傳世的《離六堂集》，因出版時間不同分為兩類，以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692-1694)為界，這段時間大汕與屈大均關係惡化直至絕交，在此之前出版的《離六堂集》有屈大均所作的〈序〉，據說書中大汕〈自序〉也由屈大均代筆。後出的則把屈氏之〈序〉取消，以吳壽潛之〈序〉代替。

這次點校，以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的《離六堂集》作底本，以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所藏作參校。北圖藏本是早期版本，有屈大均的〈序〉。中山圖書館所藏的則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後的版本。除了以吳壽潛〈序〉取代屈大均〈序〉外，還增加了大汕晚年的詩作《離六堂近稿》。該書在早期版本的基礎上，加進吳壽潛的

〈序〉及《離六堂近稿》，合成最完整的一本《離六堂集》。

從這些作品創作的時間來推斷，北圖所藏懷古樓刻本《離六堂集》應編訂於《離六堂二集》與《潮行近草》之後，其中《離六堂二集》應是大汕在廣州住持長壽寺之後的唱和酬答之作；而《潮行近草》所收則為康熙二十二年大汕潮州之行中的作品；《離六堂集》中的其他作品則包括了大汕初到廣東及稍後應邀北上遊歷京師、中原和江南等地時的創作，這些都應該是他應邀出海赴越南傳法前的作品。《離六堂近稿》所收諸作，從其反映的內容和心態來看，則應是大汕自越南返回，到最終被驅逐出粵期間的作品。

留存至今的大汕所作《離六堂集》、《離六堂二集》、《潮行近草》和《離六堂近稿》等，為我們瞭解清初的社會文化歷史，特別是研究當時的嶺南文化史和南方禪宗史，提供了相當寶貴的資料。

《海外紀事》是大汕赴大越國弘揚佛法時所撰，記述時間由康熙二十二年(1683)秋大汕在廣州長壽寺接見大越國王的專使並接受遠赴大越弘法的邀請，至來春渡海抵越，年底返國遇風折回重赴順化而止。

在《海外紀事》一書中，大汕詳盡地記述了他赴越弘法的因緣、經過，所見各類人物，各處的風土人情、制度習俗，旅越華僑的生活動態，還記錄下與大越國政要往來書劄、議論、禪論，以及當時所寫的律、絕詩一百多首。

明清之際社會動盪，加之清初東南沿海海禁，中外交交通受阻。大汕在遷海令取消後不久即前往大越國，且能詳細記錄所見所聞，保留了當時大越國政治、宗教、文化、經濟、軍事、外交等多方面真實的史料，為中越關係、越南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素材，實在是中越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大汕海外弘法時，正是其望高名重的時候，他在大越國得到國王、貴戚、大臣及民眾的大量布施，出國弘法又令他在嶺南獲得很高的聲譽。如前所述，大汕一貫重視刊傳他的著作，從大越返國後，在整理舊刻準備重刊《離六堂集》的同時，很快就刻印《海外紀事》出書。後來該書還出過不同的版本，至今在北京、上海、廣州、臺灣、日本等地的圖書館都有收藏《海外紀事》，就所見至少有三種版本。

首先，上海圖書館所藏《海外紀事》是早期的版本，它只有丙子年（康熙三十五年，1696）大越國國王阮福暉的〈序〉，而且書中少數字與後出本有異。此本應當是在大汕回國的當年（丙子）或次年出書。

其次，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1699-1703)間的刊本，此版增加了仇兆鰲、

徐鉉、毛端士於康熙三十八年分別為《海外紀事》所寫的序。而康熙四十二年大汕被逮入獄，流放以死，諸作絕版。大汕文學修養相當高，有記室弟子校訂、隨杖侍者編輯，又富於錢財，因此《海外紀事》的刻印質量很好，版面清楚，錯訛之處極少。日本東洋文庫所藏的《海外紀事》就是這樣一種善本。

最後，根據陳荊和先生《十七世紀廣南之新史料》卷一所述，《海外紀事》還有一種劣本。據稱，在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海外紀事》，「毛〈序〉及仇〈序〉均不全，其次序也變動，且不見阮福週敘文；其付梓之狀態亦缺佳，書中到處有脫字、脫文及缺張」。可見製作之差。估計是書賈為謀利而粗製濫造所致。

這次整理，以東洋文庫藏《海外紀事》作底本，以上海圖書館藏本參校。錯字疑難處出校注。

其正文目錄如下：

《離六堂集》：曾燦〈離六堂詩序〉、王培〈厂翁詩集序〉、熊一瀟〈序〉、張總〈厂翁詩集序〉、屈大均〈離六堂詩序〉、高層雲〈離六堂集序〉、唐化鵬〈離六堂詩序〉、徐鉉〈離六堂集序〉、吳綺〈厂翁詩集序〉、梁佩蘭〈離六堂詩序〉、樊澤達〈離六堂詩集序〉、周在浚〈離六堂詩集序〉、陶煊〈離六堂詩集序〉、吳壽潛〈離六堂詩集序〉、李方廣〈厂翁燕遊詩序〉、毛際可〈厂翁燕遊詩序〉、大汕〈自序〉、離六堂詩評（陳維崧、張杉、方文、王培、吳伯朋、魏憲、徐作肅、陳昌國、宋肇、童樞、黃河圖）。次正文目錄：卷一至卷十，詩；卷十一，雜言、跋、序；卷十二，詩餘。

《離六堂二集》：高層雲〈石濂和尚詩序〉；次卷一，七言古；卷二，五言律；卷三，七言律。

《潮行近草》：吳綺〈潮行近草序〉、林杭學〈潮行近草序〉、馬三奇〈潮行近草序〉、次卷一，五言律；卷二，七言律；卷三，雜言。

《離六堂近稿》：一卷。

《海外紀事》：仇兆鼐〈序〉、徐鉉〈紀事序〉、毛端士〈序〉、阮福週〈本師海外紀事序〉；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附錄大汕和尚畫選。

由上可見，先後為大汕著作寫序題辭的士人超過三十位，大都是官員、文人、詩家、學者。其中如「嶺南三大家」之屈大均、梁佩蘭，高中「博學鴻詞」科的陳維崧、徐鉉，「易堂九子」之一的曾燦，康熙進士、「太常三絕」之一的高層雲，詩文家毛際可、吳綺、周在浚，與從子方以智聲名相頡頏的遺民詩人方文等，無一

不是詩文詞方面的專家。大汕能招致如此多的大家為其作序題辭，不但反映他交遊廣泛，影響遠大，也體現出他具有深厚的多方面的文化藝術修養以及高超的個人魅力。

此書由萬毅、杜靄華、仇江編輯點校，萬毅、仇江撰〈前言〉，中山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三月第一版。

（三）《華嚴叢書》

《華嚴叢書》由華嚴寺編纂出版。華嚴寺位於廣州市花都區，係在原來的古觀音殿的基礎上新建，至今大殿、法堂等主要建築已經完成，而其他配套工程還在修造之中。住持僧印覺法師，是本煥老和尚的嗣法門徒，向來對於佛門經典文史及僧徒的學養栽培非常重視。早在二〇〇三年便著手籌建華嚴寺佛學研究所，並開始策劃《華嚴叢書》的編纂出版。近年華嚴寺正全力興建，資金十分緊張，印覺和尚盡力籌資，保證了此套叢書得以陸續出版。

本煥老和尚稱「廣州華嚴寺發『法供養』之心」，「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勝舉」。欣然為《華嚴叢書》題寫書名，並撰寫〈總序〉，謂：「通過適當的選材、精當的校勘和恰當的編輯，既為廣大學佛信眾提供一些更為準確可靠的誦讀經典，又為眾多佛學研究和愛好者貢獻一批校勘精審的基礎文獻。」又稱叢書設立《清初嶺南佛門史料》系列，「對清初嶺南諸家有所側重，不僅因為嶺南這一時期的佛門文獻非常重要而難於蒐求，還因為編者長期在嶺南接受佛法的薰陶，不能遺忘一方法乳養育之恩」（〈華嚴叢書總序〉）。

天然和尚為清初嶺南諸家之翹楚，清代番禺縣慕德里司迺徑村人，該村位於今日花都區，與華嚴寺近鄰，故印覺法師在《清初嶺南佛門史料》系列中特闢《天然和尚專輯》，把天然和尚的經解語錄、詩文雜著先行整理出版。

《天然和尚專輯》中《海雲禪藻集》、《天然禪墨》兩種於二〇〇四年出版，宣紙線裝。兩年後，《睹堂詩集》、《天然昆禪師語錄》及《天然和尚年譜》三種嗣出。

下面把《天然和尚專輯》三種作「敘錄」分述如下：

1. 海雲禪藻集、海雲文獻輯略

該書含兩部分：《海雲禪藻集》，清徐作霖、黃蠡等編，黃國聲點校；《海雲

文獻輯略》，黃國聲輯錄。西泠印社二〇〇四年十一月第一版。

《海雲禪藻集》凡四卷，收錄天然函昞的弟子「今」、「古」、「傳」三代僧人及同時的居士共一百二十八位，舉凡與天然和尚及海雲寺有關之詩作計一千零一十首；其中詩僧六十位七百三十二首。關於《海雲禪藻集》編者署名徐作霖、黃蠡，據民國二十四年乙亥(1935)重印時汪兆鏞的〈序〉說：「《海雲禪藻集》一書，凡所採錄，附著里貫、行誼，考嶺南明遺老軼事，以此書為最詳。顧卷首所列編纂之人，皆無可考，意者一時名輩之假託，不欲以姓氏流傳如月泉吟社之例。乾隆初，列入禁書目中。」即認為該書的編纂者像元初宋朝遺民的月泉吟社那樣，為避免當局的迫害，所以都沒有署自己的真名，而是假託了他人的名字。查徐作霖是明末才子侯方域的好友，方域回家鄉河南商丘時，常與他一起結社酬唱。侯方域《徐作霖、張渭傳》說他「好學深思，常偃仰臥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為高文典冊焉」。唯據《明史·列傳·忠義》載，徐作霖於崇禎十五年(1642)李自成軍攻破歸德城之時已經殉難，事在甲申(1644)之前，而函昞開山海雲寺是在清順治五年(1648)，《海雲禪藻集》的問世則更遲；估計汪〈序〉因此認為是編者假託的署名。

據汪兆鏞之子宗衍後來記述：「先君《微尚齋雜文》載此序，刪去『顧卷首所列』至『如月泉吟社之例』三十六字。初不解其故，後輯《天然弟子考》，檢《粵東詩海》，始知黃蠡、李芬名列卷中，非假託者，故刪之也。」

據查《海雲禪藻集》，八位編輯者徐作霖、黃蠡、王錫遠、黎璲元、劉堯則、李芬、陳王道、謝殷臣，其中只檢出黃蠡、李芬二人：「黃蠡，字對廬，番禺人。布衣。著有《二山樵詩草》。」（《粵東詩海》，卷 69）「李芬，字莖九。番禺人。清初以詩鳴，後祝髮於廣州海幢寺。著有《二守堂稿》。」（《粵東詩海》，卷 63）

其餘六人未詳，或真有如汪兆鏞所謂「一時名輩之假託」，亦未可知。

海雲系是清初佛教曹洞宗在廣東的一個分支，其核心人物函昞(1608-1685)於崇禎十三年(1640)到江西廬山歸宗寺參禮曹洞宗第三十三代傳人、著名高僧道獨空隱，薙髮為僧。清順治五年(1648)，天然被門徒今湛迎主番禺員岡之雷峯山隆興寺，隨改名「海雲寺」，遂成為海雲寺的開山祖師；在清初嶺南的歷史舞臺上影響深廣的佛門海雲系，亦因此而產生。

甲申鼎革，清軍南下，明官紳士民紛紛越嶺南來。他們或以軍事手段，開展抗

清門爭；或隱跡山林，躲避當道；或以「逃禪」方式遁入佛門，以表達對異族統治的不滿與抗拒。正如邵廷采《遺民所知錄》自序所載：「明之季年，故臣莊士往往避於浮屠，以貞厥志，非是，則有出而仕者矣。僧之中多遺民，自明季始也。」而德高望重的天然函昱，便成為了眾多孤懷遺恨的遺民參禮的對象。汪宗衍先生《天然和尚年譜》謂：「和尚以文人慧業，深入真際，有叩即鳴，道聲由是遠播。顧和尚雖處方外，仍以忠孝廉節垂示及門，故未幾國變，文人學士、縉紳遺老多皈依受具，每於生死去就，多受其益，甚深締信。」在清初風雲激盪的時代，海雲寺實際上是志節之士的託身立命之地和潛通聲氣之所，而函昱則成為嶺南明朝遺民所宗奉的精神領袖。汪兆鏞〈序〉云：「吾粵士夫夙尚氣節，明社既屋，義師飄起，喋血斷脰而弗顧者踵相接。而天老人識燭幾先，盛年披緇，開法於番禺雷峯之麓海雲寺。滄桑後，文人才士以及仳離故宦多皈依受具，其跡與起義諸人殊，而矢節靡它其心則一也。」

古云：「國家不幸詩家幸。」舉人出身的函昱在詩歌創作方面具有高度的修養，他和師弟函可並稱清初嶺南兩大詩僧，函昱有《瞎堂詩集》二十卷，函可有《千山詩集》二十卷，皆傳世。清初的海雲寺，成為當時墨客騷人的薈萃之所。在「今」字輩和「古」字輩僧人中，有不少是著名詩人，例如曾拜函昱為師而後還俗的今種（字一靈），就是在詩壇上位居「嶺南三大家」之首的屈大均；而「三大家」的另外兩家陳恭尹和梁佩蘭，都曾禮拜過函昱。今無、今釋等高僧的詩作，亦有很高境界。海雲系的俗家居士，例如陳子壯、黎遂球、梁朝鍾、薛始亨、何鞏道、程可則、羅賓王、王邦畿、陶璜、黎延祖、謝楸、袁景星、屈修等人，都是一時名士，均有詩集傳世。《海雲禪藻集》收入「今」、「古」、「傳」三代僧人與居士共一百二十八位，收入的作品一千餘首，蔚為大觀，反映了嶺南詩壇在這個時期與佛教結緣而達到的空前盛況及其在文學史上的重大影響。

《海雲禪藻集》為《雷峯志》的一部分，乾隆間被列入禁書目，清〈禁燬書目補遺一〉云：「《海雲禪藻集》乃雷峯諸僧之詩，中有金堡詩句，其他亦多冗雜不倫，應請銷毀。」該書被禁燬半個多世紀後，至道光十年（1830）有番禺陶克昌如不來齋刊本，有陶氏之序。後因潦災，版片漂失，故家藏本亦復無多。民國二十四年（1935）由逸社同人排字重印，有汪兆鏞〈序〉。

《海雲文獻輯略》為《海雲禪藻集》的補充，由中山大學黃國聲編纂。

黃國聲，字振希，號希齋，廣東惠州人。生於一九三二年。中山大學中國古文

獻研究所教授。他在〈編例〉中說：「海雲為嶺南上刹，而文獻記載，恒苦不足，僅存《海雲禪藻集》一書，稍資考鏡，誠為憾事。茲所採錄散見於僧、俗諸家著述之資料，或可略補闕亡。」「凡有關涉海雲文獻史跡之文字，不論詩、文、詞、書啟、禪頌，概予採集」。共輯得天然、剩人、今釋、今無、成鷲等三十餘人詩文近三百篇，並承《海雲禪藻集》之例，撰為作者小傳，「凡有所錄，分別介紹作者生平」，並注明出處，以備查考。《海雲文獻輯略》之增補，使全書能更完整地反映海雲詩派的全貌。

新整理的《海雲禪藻集、海雲文獻輯略》目次如下：

天然和尚畫像、釋本煥〈華嚴叢書總序〉、蔡鴻生〈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系列總序〉、黃國聲〈海雲禪藻集、海雲文獻輯略序〉；海雲禪藻集目錄：凡例、汪兆鏞〈序〉、卷一，今無等七人、卷二，今湛等二十九人、卷三，今錫等二十五人、卷四，袁彭年等六十八人、校記三十二條；海雲文獻輯略編例、輯錄釋函昞等三十六人詩文、黃國聲〈跋〉。

2. 天然禪墨

《天然禪墨》，朱萬章編纂。華寶齋古籍書社出版，二〇〇四年十月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印刷。

朱萬章，四川眉山人，一九六八年生，一九九二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專業，現在於廣東省博物館從事書畫、金石鑑藏，整理與研究。廣東美學學會會員，廣東書法家協會會員，發表美術史論文多篇。

《天然禪墨》匯集了廣東省博物館、廣州藝術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香港何氏至樂樓、臺灣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等處收藏的天然和尚墨寶原件及拓本、法帖，讓世人一睹天然傳世之珍，不單為佛門盛事，亦是書法藝術界之快事。

該書正文一，圖版目錄：行書和梅影詩七律，行書棲賢山居詩（一）（二）、行書惜暗夜籠月、行書五絕詩、行書議建殿宇卷，行草浴日亭詩、行草書、行草詩扇面、行草今無唱和法偈卷，行草五言詩、行書七言聯、行書竹簡拓本、行書梅花詩、行書棲賢山居詩（法帖）、行書四言偈（法帖）；二，釋文；三，天然和尚及其書藝論略；四，天然和尚各藝術活動年表；五，各家評論摘錄。

編者對天然墨寶作了注釋，對天然的書法藝術以及以天然法屬為骨幹的「海雲書派」作了介紹及評價。書末摘錄了古今人士對天然書法的評論，可說是對天然書

法藝術研究成果的匯集。這是介紹研究天然和尚書法藝術的首個專集，也是《清初嶺南禪墨》的第一種。

該書卷首有陳永正〈清初嶺南禪墨序〉。

陳永正，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教授，當代著名詩人、學者、書法家，寫〈序〉時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廣東省書協主席。

陳永正謂：「天然大師及其門下弟子『十今』皆善書，後世稱為『海雲書派』。」「僧人之書，無論是何種書體，何種風格，自有一派禪家氣象。」因此該書命名《天然禪墨》。

書法家麥華三評價說：「吾粵高僧之能書者，以函崑為最有名。」「嘗見其七言聯『淺深綠樹藏茆屋，開落紅花蔭草籬』，筆勢夭矯，筆力蒼勁，字徑或大或小，歷落有致。又見其阿侍者詩偈，書法北海，極得筆意，海雲諸『今』所從出也。」（〈嶺南書法叢譚〉，《廣東文物》〔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卷3）

3. 天然是禪師語錄

《天然是禪師語錄》，清釋函崑撰。陶乃韓點校，香港夢梅館二〇〇七年十一月第一版。

天然和尚著作甚多，詩作有《天然和尚梅花詩》、《天然老和尚古詩》、《丹霞詩》、《瞎堂詩集》；經解語錄類則有《首楞嚴直指》十卷、《楞伽心印》四卷、《金剛正法眼》、《般若心經論》、《禪醉》、《天然和尚同住訓略》、各剎《語錄》、《天然是禪師語錄》十二卷。

康熙三十年（1691），天然的嗣法弟子今辯奉曹洞宗嶺南華首一系三代高僧（包括華首空隱道獨、雷峯天然函崑、千山剩人函可、海幢阿字今無、丹霞澹歸今釋）的經解語錄入《嘉興藏》。天然入《藏》的《語錄》，題為《廬山天然和尚語錄》，和尚粵中番禺人，一生弘法嶺南，主持諸寺又大多在粵地，而稱「廬山天然和尚」者，想是因其祝髮受具於廬山歸宗寺，後又曾住持歸宗及山南棲賢寺之故吧！

天然座下文士甚多，講經問答多有紀錄刊布，先後有《訶林語錄》（崇禎十年，1643）、《雷峯語錄》（順治十五年，1658）、《丹霞語錄》（康熙九年，1670）、《棲賢語錄》等面世，隨處說法，隨時結集。

和尚寂後，其法徒今辯收集和尚在諸剎開示之語錄，補充整理，再加上日常積

累的各種文字資料，編纂成《天然昆禪師語錄》十二卷，即刊載於《嘉興藏》者。

當年天然各刹《語錄》，沒能留存至今，具體內容無由得知。看今辯編纂之《語錄》，前八卷分別為上堂、小參、普說、茶話、垂示、舉古、問答、頌古，俱為《語錄》之內容；而卷九至卷十二則為贊、偈、銘、書問、雜著（其中為論、文、疏、序、跋、壽文、塔銘）。這四卷的內容很明顯是屬於「文」的範疇。天然和尚有詩集存世，文集則付闕如，想來今辯為本師重編《語錄》，把手邊應屬文集的資料都收到其中，因此，該書也可看作是天然的文集吧！

時至乾隆，清廷統治已穩，乃廣布文網，肅清思想。因澹歸《徧行堂集》文字獄案之牽連，《天然昆禪師語錄》也被列入禁書，《禁書總目》、《違礙書目》均有之。清代〈禁燬書目補遺一〉稱：「《天然和尚語錄》一本，釋函昆撰。函昆行狀，係金堡所作，語句亦有干犯處，應請銷毀。」其中把天然〈行狀〉的作者說成是先此示寂的澹歸，以此罪連天然，致《天然昆禪師語錄》刊本消失人世，專制之野蠻殘暴，一至於此！猶幸依賴《嘉興藏》佛典之庇藏，《天然昆禪師語錄》得以存世至今，實乃佛門之慶，世間之幸。

又據冼玉清先生記：「（《天然昆禪師語錄》）故宮藏有一部，承陳援庵先生假抄一本寄贈。」（《冼玉清文集·釋家著述考（二七）函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如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所分別收藏《天然昆禪師語錄》手抄本各一（駱偉主編：《廣東文獻綜錄》〔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大概也是分別重抄的。

天然和尚的俗家弟子、丹霞山別傳寺的大護法陸世楷謂：「本師天然和尚夙領儒宗，久膺祖席，身乘五衍，心入三摩，譬如洪鐘萬石，有扣則鳴，遙源千頃，無挹不注。向在雷峯、棲賢、華首、訶林諸山，皆有語錄行世，學人奉為津筏，寶若琬琰矣。」（陸世楷：〈天然昆禪師語錄序〉）介紹了該書產生的過程以及世間學人的反映。而與天然和尚「于法門為弟昆，然實受師資之益」的釋函修在其〈天然昆禪師語錄序〉中更讚頌了天然在末法時期「目空今古道風高，世出世間扶正氣」（湯來賀：〈天然昆和尚塔誌銘〉）的崇高志向：「使天下後世知此百犬吠聲、群盲相引時，猶有人提倡斯事，佛祖慧命庶幾不斷，而後乃相安於無言。此師之志也。」

今整理本《天然昆禪師語錄》，首釋函修〈序〉；次今轉梁殿華〈序〉；次今互陸世楷〈序〉；又次總目：卷一，上堂；卷二，小參；卷三，小參；卷四，普

說；卷五，普說、茶話；卷六，室中垂示；卷七，問答、頌；卷八，問答、頌古；卷九，贊、偈、銘；卷十，書問；卷十一，雜著；卷十二，雜著、佛事；又次釋今辯〈本師天然昆和尚行狀〉；次湯來賀〈天然昆和尚塔誌銘〉。又次陶乃韓〈天然昆禪師語錄跋〉；次校記。

此次點校，以《嘉興藏》中《廬山天然禪師語錄》（臺灣新文豐影印本）為底本，取天然一脈師弟之著作《宗寶道獨禪師語錄》（《卍續藏》本）、《千山詩集》（道光廣州海幢寺本）、《徧行堂集》（乾隆丹霞別傳寺本）等作參校。《天然昆禪師語錄》原本中之俗字、異體字、通假字，酌情改為正體字；缺字或難辨字以□標示；錯字改正等俱出校記。校記總附全書之後。又原書後附有天然和尚《梅花詩》、《雪詩》，因已有專門的詩集點校本出版，該書不再附錄。

三、思考與建議

二〇〇八年八月，整理、出版工作告一段落。諸書面世，謬蒙僧俗兩界人士許可，差堪告慰。至下一步當如何開展，尚待規劃，我對此粗有構想，試述如下。

《嶺南名寺志·古志系列》已經完成，「今志系列」當可提上議事日程。實際上，已經有寺院向我們提出為他們修纂寺志的請求，我們也從前年開始為丹霞山錦石巖寺修志做準備工作，例如為該寺的古摩崖、碑刻製作拓本，收集各方面的有關資料。由於時代發展，社會結構、意識形態古今有很大差別，寺志的內容、形式必然有相當的變化，如何編撰現今的寺志，讓僧俗都能接受、滿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關係到佛門的歷史能否保存下去，傳之久遠，很值得我們重視。正在編撰中的《丹霞山錦石巖寺志》是《嶺南名寺志·今志系列》的第一種，我們要小心謹慎，爭取佛門對該項工作的指導、參與，同時盡量爭取有關管理部門的指引、支援。初稿完成後將向各界人士徵求意見，集思廣益，盡量做到最好，爭取僧俗兩方都滿意。這事做好了，會是一個長期的也可能是規模較大的項目。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已出第一輯四種約二六〇萬字，第二輯十四種，字數與第一輯相若。估計第二輯的整理工作，當可在明(2009)年內完成。清初這段時期的史料整理結束之後，可把時間段向上下伸展，由後漢至清末，其他時間亦可分段整理，集中起來，就可以合成一套自古至今完整的《嶺南佛門史料叢刊》。

至於《華嚴叢書》，由華嚴寺籌措資金編纂出版，所定書稿完成後，遇有機

緣，便可印製，並無嚴格的完成時限。故而我們根據其因緣而進行，隨時盡力協助即可。

另外，在對文史資料進行整理點校的同時，也開始著手研究工作。

十年來，我們一直在做嶺南佛門史料整理，主要是點校工作。為教學、科研提供原始資料，這是古文獻研究所最根本、最基礎，也是責無旁貸的工作，所以我們首先進行的也就是文獻整理。如今《嶺南名寺志・古志系列》已經完成，《佛門史料叢刊》也有了相當的進展，我們已經可以在這基礎上從文學、哲學、史學、社會學、心理學諸方面對其開展研究。在《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全部整理完成之前，《嶺南佛教研究叢書》也可以上馬，兩者並駕齊驅，佛門和世俗的專家共同參與，讓有關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同時得到發展。

暫告一段落的嶺南佛門文獻整理，只是中山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很小的一個項目，但是也動員了許多人力物力，花費了不少時間和資源，十年所標，俱為眾柴之焰。特別感謝指導老師黃國聲、陳永正、蔡鴻生、葉顯恩等教授，感謝參與整理工作的同事、朋友們，感謝在史料方面大力協助我們的圖書館的朋友們，感謝資助整理及出版的善長仁翁；還要感謝給我們支持與指導的佛門大德本煥老和尚、機修老和尚、明生大和尚以及印覺大和尚等大師，沒有僧俗兩界的共同參與和努力，這項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